

城市圖像的建構：近百年來明清城市史 研究的轉折與拓展

王鴻泰^{*}

本文考察明清城市史研究發展的過程，探究不同時代下的研究取徑，耙梳近百年來學者如何在不同的脈絡中，建構出不同的城市面貌。概略而言，明清城市史研究濫觴於 1930 年代，由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出發，至 1960 年代則多有從社會經濟史脈絡下的城市探究，至 1990 年代後，乃有社會生活史與文化史取徑的研究面向，從而開展出城市生活文化的豐富面貌。

關鍵詞：資本主義萌芽、城市社會、市民階級、社會文化史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Email: wanght@asihp.net。

前言

「城市」是什麼？城市在整體社會生活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中國城市的特色是什麼？明清時期的城市有何重要發展？這些問題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問題，是城市史研究首先要面對，也需要一直面對的問題。大體而言，明清城市史的研究正是圍繞著這些問題而開展，也因為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設想，而發展出不同的研究取徑，以致彼此之間有種種爭論。

然則，城市史不只是城市史，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城市史研究，在許多時候往往被賦予特別的期許眼光。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城市的發展可以視為是一種歷史發展的指標。明清城市史的研究在「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熱潮中，明清的城市發展更成為探究資本主義發展狀態的重要切入點，甚或已經成為見證資本主義已然萌芽的觀點或論據。這當中固然有意識形態為之牽引或指導，然則，即使不在資本主義萌芽的脈絡中，僅就中西歷史發展的客觀時間來看，十五、六世紀也確實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期，而城市的變化，也正呼應、見證此種轉折。無論中國或西方，此時期的城市，無論就其外在的擴張發展或內部的工商活動，乃至於市民生活方式的新形態，都呈顯出一種有別與以往的發展趨向，彷彿預示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來臨。

城市本來就是政治力量所造就出來的特定空間，尤其是都城更可說是政治權威的具體展現，所以城市史的研究也不可免地是政治史的一環，甚至是相當核心的部分，因而城市史的研究也多濫觴於都城的探究。其次，城市的面貌也深受經濟活動的影響，所謂城市繁榮，往往出自工商業活動所致，可說正是經濟力量的展現，尤其近世以來，市場經濟的發達程度，幾乎已經成為城市繁榮的主要決定力量。再者，城市的繁榮也吸引各色人等入居其中，從而在城市中展開各種活動。除了軍政人員執行職務與工商業者的生計活動外，更有各種消費與娛樂活動從中展開，以致吸引各方人等入乎其中、活動其中、樂在其中，城市生活因而豐富精采，文化也別具色彩。城市也因此成為有別於農村的生活空間，乃至形成別具一格的文化形態。凡此種種，城市研究乃成為政治史、經濟史與生活史、文化史皆可涉入，且都牽扯甚深的研

究領域。只是，其研究取徑與面向也因時而異，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關懷與注重的面向。或許，城市的研究史，是學術的發展史，也是學者的心態史。

誠然，城市史的研究有各個不同的面向，隨著時代環境的發展與現實關懷的差異，對城市的想像與心態也相異其趣，這深切影響城市史研究的基本態度與設想，而學術命題因時而異的不同設定與研究方法的推陳出新，更讓城市研究著落於不同的論述語境與脈絡中，其思考導向與架構，也大相逕庭，以致勾勒出來的城市的歷史圖像也各有不同。本文嘗試從學術史的角度，觀察明清城市史研究發展的過程，探究不同時代下的研究取徑，耙梳學者們如何在不同的脈絡中，建構出不同的城市面貌。概略而言，明清城市史研究濫觴於 1930 年代，由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出發，1960 年代則多有從社會經濟史脈絡下的城市探究，至 1990 年代後，乃有社會生活史與文化史取徑的研究面向，從而開展出城市生活文化的豐富面貌。

一、政治史範疇下的城市史

首先，城市是一種與人群組織相關的社會體制，它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建構出來的一種制度，更直接地講，它是一種政治權力的具體化與憑藉。由這個角度來看，可以將城市視為一種政治制度。傅築夫說：

中國的城，從古代到近代，從王都到郡縣，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政府根據其統治制度的編制，特別是根據其防禦的需要，有目的、有計劃地興建的；換言之，中國歷代的城，沒有一個是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和人口的聚集，而逐漸發展演變為城市的。或者更具體地說，中國的城沒有一個是由人民根據其自己的需要，把一個工商業會萃的地點自行改建為城市。中國所有的城，都是由政府興建的。¹

在傅氏的理解下，中國的「城」市是一種統治體制，是政治權力所建構出起來作為政權運作系統的一個環節。就此可以說，城市就是政治權力的展現及其具

¹ 傅築夫，〈中國古代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419。

體化。既然城市是政治權力的體現，那麼城市也就可以被當作一種政治制度史來探討。這種制度史範疇下的城市史研究可說是一種比較基礎性的研究，也是城市研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取徑。

在政治視野下的城市，是一個發揮行政與軍事機能的管理中心，這種特性尤其顯現在都城問題的思考上，明清城市史的研究也差不多就是從明初的定都問題開始的。30年代中期，《清華學報》第10卷第4期，以及《禹貢半月刊》第2卷第11期同時出現兩篇討論明初定都問題的文章：吳晗的〈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和華繪的〈明代定都南北兩京的經過〉。²這兩篇論文所開啟的定都、遷都問題在後來陸續有所討論：70年代Edward L. Farmer（范德）所著之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F. W. Mote（牟復禮，1922-2005）的“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及80年代徐泓的〈北京行部考〉、張奕善的〈明成祖政治權力中心北移的研究〉、朱鴻的〈從南京到北京：明初定都問題的討論〉、倉持德一郎的〈明初における富民の京師移徙：所謂「富戸」の設定〉與佐藤学的〈明初北京への富民層強制移住について：所謂「富戸」の軌跡を中心に〉等，都可以說是這個問題的延續或延伸。³這類「定都」問題的討論，大體上是站在統治立場，探討

² 吳晗，〈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清華學報》，10：4（1935），頁917-940。華繪，〈明代定都南北兩京的經過〉，《禹貢半月刊》，2：11（1935），頁34-41。在此之前，雖不能說明清城市研究全然荒蕪一片，但一則相關著作為數甚少，再則，這些為數甚少的著作，或者屬傳統方志的寫法——如王曼犀的《金陵後湖志》（南京：翰文書店，1933），王煥鑣編的《明孝陵志》（南京：鍾山書店，1934），或者只是考據之作——如葛定華的《金陵明故宮圖考》（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組，1933）。真正以城市為專題的論證性文章，大概可以說是由吳晗與華繪的這兩篇文章開始的，當然這兩篇文章也可以說是以考證為主，不過，它們終究是以現代論文形式所寫成且具有議題性的「論文」，所以，將這兩篇文章視為明清城市史的開山之作應無不可。

³ Edward L.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F.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1-153。事實上，Mote的文章是一篇綜論的文章，前半部分概念性地討論中國城市的特性——特別是相較於西方的城市，後半部分則綜論南京城的位置與歷史沿革，以及朱元璋立都的種種考量與過程。徐泓，〈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2：2（1984），頁569-598。張奕善，〈明成祖政治權力中心北移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10、11期合刊（1984），頁243-357。朱鴻，〈從南京到北

城市的政治、軍事意義，就城市研究而言，這種討論取徑可說是屬外在性的考察。

除了以政治為主題，城市為受格的討論外，真正以城市為主體的討論，大概也是從都城開始。20 年代 Osvald Siren（喜龍仁，1879-1966。該書對其中文名誤譯為喜仁龍）所著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討論北京城的建築與空間問題，⁴張其昀也開始對南京的歷史地理進行探討，先後發表〈金陵史勢之鳥瞰〉、〈首都之國防上價值〉、〈首都之地理環境〉等文章；⁵30 年代朱偁對南京史蹟加以實際調查後撰《金陵古蹟圖考》，⁶之後又寫作《北京宮闕圖說》、《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對明清北京城內的宮殿建築進行考察；⁷此後今西春秋、侯仁之、陳正祥、王劍英、謝敏聰、賀樹德、邱仲麟等人陸續對北京的建築、地理與人文環境進行更深入的研究。⁸這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侯

京：明初定都問題的討論》，《師大學報》，33（1988），頁 259-282。倉持德一郎，〈明初における富民の京師移徙：所謂「富戸」の設定〉，收入《石田幹之助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石田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1965），頁 239-252。佐藤学，〈明初北京への富民層強制移住について：所謂「富戸」の軌跡を中心に〉，《東洋學報》，64：1、2（1983），頁 69-98。

⁴ Osvald Sire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Lo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imited, 1924). 中譯本：奧斯伍爾德·喜仁龍 (Oswald Siren) 著，許永全譯，《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

⁵ 張其昀，〈金陵史勢之鳥瞰〉，《東方雜誌》，23：13（1926），頁 73-86；23：15（1926），頁 71-90。張其昀，〈首都之國防上價值〉，《地理雜誌》，1：2（1928），頁 53-56。張其昀，〈首都之地理環境〉，《地理雜誌》，3：2（1930），頁 1-8；3：3（1930），頁 1-8；3：4（1930），頁 1-10。

⁶ 朱偁，《金陵古蹟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⁷ 朱偁，《北京宮闕圖說》（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書中〈自序〉寫於 1936 年 5 月。朱偁，《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書中〈自序〉寫於 1936 年 6 月 23 日。不過，實際的寫作順序應是《明清兩代宮苑建置考》在前，因《北京宮闕圖說》〈自序〉中言：「余既寫《元大都宮殿圖考》及《明清兩代宮苑建置考》，因復輯《北京宮闕圖說》，為《故都紀念集第三種》問世。」這兩本書後收入程演生輯，《北平地方研究叢刊·第 2 輯·故都紀念集》（臺北：古亭書屋，1970）。

⁸ 今西春秋，《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說》（北平：建設總署，1941）。侯仁之，〈北平金水河考〉，《燕京學報》，30（1946），頁 107-133。侯仁之，〈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5：1，頁 139-165，收入《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 272-307。陳正祥，〈北平的城市發展〉，《中國文化地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頁

仁之對北京城的研究，他在 1940 年代中日戰爭期間，即開始關注北京城的歷史地理問題，戰後留學英國三年，寫成博士論文《北京的歷史地理》。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隔年他應梁思成之邀擔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更積極從事北京城歷史地理的考察，先後寫成〈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等論文。侯仁之的研究與新政權之首都規劃密切相關，頗有以古為鑑，甚或古為今用之意，他對北京都城的研究與現實關懷糾結甚深。他在 1977 年有一篇與吳良鏞合寫的〈天安門廣場禮贊：從宮廷廣場到人民廣場的演變和改造〉，篇首小標題即為「毛主席紀念堂巍然屹立在天安門廣場上」，其中言道：「它（天安門廣場）象徵著祖國人民海洋般的胸襟，無窮無盡的力量。」而末節「天安門廣場的新生」之末句更言：「天安門廣場的前景，也必將隨著我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不斷勝利而更加燦爛輝煌。」⁹可見其歷史論述充滿現實性與時代感，事實上，他的都城研究與建設本是兩面一體，都合拍於民族國家的發展，當中有極深的現實關懷與情感寄託。反過來說，像這樣的都城研究也可說正是時代的產物，乃因應於現實的發展，與政權的建立和國家的建設密切結合，相互為用。

這類關於都城建置的研究概可歸類於「制度史」範疇，其特色或許可以

101-134。據作者〈自序〉，該文原本「是國際研究中國之家於 1977 年出版《中國研究叢書》第三號《北京》一書的摘要」。王劍英，〈明初營建中都及其對改建南京和營建北京的影響〉，《歷史地理》，第 3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86-97。謝敏聰，〈明清北京的城垣與宮闕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又，謝敏聰所著《宮殿之海紫禁城》（臺北：世界地理雜誌社，1983）收有〈紫禁城及北平大城設計的宇宙觀與世界觀〉（頁 6-7）、〈紫禁城建置的人文觀與宗教觀〉（頁 8-10）兩文對北京城的設計理念進行探討。其實，關於城市建築的設計理念，尤其宇宙觀的討論早在 70 年代 Arthur F. Wright（芮沃壽）即已展開有系統的論述，參見氏著“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3-73。賀樹德，〈明代北京城的營建及其特點〉，《北京社會科學》，1990：2，頁 111-118。此外，邱仲麟，〈明代北京都市社會的變遷（1368-164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第一章〈地理形勢、氣候與都市環境管理〉部分也綜合前人研究，論及北京城建築的規劃設計。

⁹ 侯仁之、吳良鏞，〈天安門廣場禮贊：從宮廷廣場到人民廣場的演變和改造〉，《文物》，1977：9，頁 1-15。

楊寬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為代表，這部著作正如西嶋定生所言：「基於都城的平面佈局發展與禮制及政治史相關聯這一新觀點，實證地、綜合地闡明了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發展歷史。」¹⁰不過，整體來看，這些論文大體上是以城市地理形勢與硬體建構為對象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將它們歸類為歷史地理或建築史的範疇。這類研究已經以城市為研究主體，而不像前述「定都」問題的討論，只是將城市當作伸展政治勢力的憑藉。不過，這種研究取徑將視察焦點集中在城市的硬體形式上，而這些硬體形式的變化基本上是出於政權的安排規劃。所以，這些論文仍屬政治史範疇內的城市研究，可以說，這種城市歷史地理或建築史式的討論乃是將城市當作政治「載體」的研究。

城市作為一個政治實體，除了外在硬體的構成外，其內在的行政系統的建構與運作更是要點，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起步較晚，大約是從 70 年代開始，新田牧雄發表〈明清時代北京にみる都市区画考〉，¹¹之後陸續有相關論文出現，如：夫馬進的〈明代南京の都市行政〉、¹²徐泓的〈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¹³ Joanne Clare Wakeland,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 Ming China: Sixteenth Century Peking*。¹⁴這些論著不只是以城市的建築形式為探討對象，而是更進一步地討論到城市整體空間規劃與實際利用情形，進而論及相應於此種規劃下的城市行政、人事組織，乃至涉及城市人口組成問題。¹⁵

¹⁰ 西嶋定生，〈日譯本序〉，收入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3。

¹¹ 新田牧雄，〈明清時代北京にみる都市区画考〉，《埼玉地理》，1（1977），頁 15-20。

¹² 夫馬進，〈明代南京の都市行政〉，收入中村賢二郎編，《前近代における都市と社會層》（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0），頁 245-297。

¹³ 徐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復刊》，10：3（1980），頁 82-116。

¹⁴ Joanne Clare Wakeland,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 Ming China: Sixteenth Century Peking*（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8）。

¹⁵ 徐泓的文章除敘及南京城的城郭、皇城與宮城建設外，也論及「都市的土地利用與人文區域」，對南京城內各個不同的活動區域作整體性的描述，同時，也對南京的人口變遷進行考察。像這樣的研究已將城市視為一個人的活動空間，而不只是一些建築形體的組合。Wakeland 的研究更利用《宛署雜記》，詳論嘉靖至萬曆年間北京

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下，城市已經被建構為一個有機體。不過，這種有機體的種種機能是由政治力量所營造出來，且成為政治權力遂行其統治目的的憑藉。所以，在此種研究脈絡中，城市仍然未脫離政治的範疇。這類制度史脈絡下的城市史研究，源起甚早，也持續有相關研究，其考察對象初期注目於都城，日後乃延伸及於地方城市。在 1990 年代初期即有建築學科研究地方城市建置的學位論文出現。¹⁶此外，徐泓除了在 1980 年代寫作〈北京行部考〉與〈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討論明初定都的問題外，至 90 年代初期又有〈明初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劃、平面布局及其象徵意義〉之作，對都城的建設格局進行討論。¹⁷至 90 年代後期更將關注點轉移至地方的築城運動，先後寫成〈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與〈從「軍七民三」到「軍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廣東的築城運動〉，¹⁸此種地方城市史研究取徑也為其學生輩所延續。¹⁹事實上，這些地方城市建設的研究，雖在某種角度下可說是從都城建制的研究延伸而來，然而，其相關問題的討論已經相當複雜，逐漸跨越政治範疇，多有涉及經濟、社會面向。

城的行政管理問題，對土地利用、人口組成，以及諸如里甲、保甲、巡警、稅務等各種管理組織進行討論。

¹⁶ 鄭力鵬，〈福州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所博士論文，1991）。韓東洙，〈清代府城的城制與營建活動之研究——以省城分析為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¹⁷ 徐泓，〈明初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劃、平面布局及其象徵意義〉，《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7（1993），頁 79-95。

¹⁸ 徐泓，〈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暨大學報》，3：1（1999），頁 25-75+381。徐泓，〈從「軍七民三」到「軍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廣東的築城運動〉，《中國地方誌》，2018：1，頁 75-92。

¹⁹ 陳怡行，〈明代的福州：一個傳統省城的變遷（1368-1644）〉（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陳怡行，〈從晚明到清初的福州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7）。（案：該書原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

二、「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與「城市社會」的建構

政治範疇下的城市研究算是比較基礎性的研究，而在明清城市史研究中，大體而言，這種研究取徑也起步較早。不過，如前所述，這種研究取徑下的城市圖像，往往被「單純化」為政治權力的憑藉物，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大多數侷限在作為政治中心之首都的諸種問題上。事實上，明清時期城市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已經突破了政治範疇——這並不是說城市已經不具備政治功能，而是說，城市除了行政、軍事性質外，也已經另外發展其他的社會機能，除了作為政、軍據點外，城市也成為其他社會活動的場域。

50年代中共開始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這場大規模的討論試圖由經濟發展來判定明清社會的特質，即「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取徑。在此一風潮下，城市也被納入社會經濟史的討論脈絡中，因而城市的經濟意義也開始被強調。傅衣凌說：

明清時代由于封建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也在發展之中，當十六、七世紀前後中國出現有不少的大城市，集中有一定數量的人口，也有很繁榮的工商業，如兩京、蘇、杭、揚州、臨清、開封等。……按我平日的考察，似乎明清時代的城市經濟大約可以成兩個不同的類型：(1) 開封型城市。這是典型的亞洲的消費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業是為這城市的地主服務的。開封之外，還有不少的小型藩封城市，如江西的南城等等。(2) 蘇杭型城市。這些城市雖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業的比重較大。此外，還有不少和工商業生產直接有關的新興市鎮。如盛澤、濮院、王江涇、楓涇、洙涇等，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心。²⁰

傅衣凌對於兩種類型城市的明確區分雖然是在 80 年代後期才提出，但他對城市經濟的探討與強調，卻早在 50 年代即已開始。50 年代「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開始時，傅衣凌已將視角投向城市經濟意義的探討上，他在 1954 年所

²⁰ 傅衣凌，〈生產、交換、市場〉，《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 151-152。

發表的〈明代江南的紡織工業與織工暴動〉中即已斷言，這些暴動是種「市民階層」的反封建鬥爭，其發生是「由於城市工商業的發達，城市人民要求解除封建的束縛愈益強烈。」²¹1956年發表的〈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中又說：「明代中葉以後，會館公所出現了，城的里社組織也漸從封建勢力手中移到工商業者方面來。」²²事實上，注意到明中期以後的城市，將研究觸角伸向城市經濟面向的發展者，不止傅衣凌一人，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熱潮中的一個支流。在1955年尚鉞所主編的《明清社會經濟型態的研究》中收有黃佩瑾所著〈關於明代國內市場問題的考察〉一文，這篇文章主要從「城市經濟發展方面」來探討明清間中國社會經濟變化與發展。黃佩瑾對南京、景德鎮、蘇州、杭州、廣州進行考察後說：「這些城市雖然仍為封建統治的中心，但主要的已經不是封建主用以防禦侵略和鎮壓人民的城堡，而是商業和手工業的中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基地了。」²³此外，同一年劉炎在〈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中說：「晚明，城市經濟的發展，正是在國內外市場擴大，商品貨幣關係發達，手工業發展的諸多條件作用下才出現的。」²⁴這些論點顯示：城市——尤其是明後期的城市，除了作為軍事、政治統治的憑藉外，它也是，或者更是，經濟活動的重要據點。這種對城市經濟意義的刻意強調反映出：在「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下，城市研究已經突破政治史的範疇，而逐漸納入社會經濟史的思考脈絡下。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政治範疇下城市史的研究重點在政治性的、軍事性的「城」，而不在經濟性的「市」；相對地，經濟史脈絡下的城市史研究則

²¹ 傅衣凌，〈明代蘇州織工、江西陶工反封建鬥爭史料類輯：附論手工業勞動者在農民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廈門大學學報（文史版）》，1954：1，頁75-81。《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327-337。

²² 傅衣凌，〈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6：5，頁95-112。《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125。

²³ 黃佩瑾，〈關於明代國內市場問題的考察〉，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明清社會經濟型態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219。

²⁴ 劉炎，〈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原載《歷史研究》，1955：6，頁29-59，收入田居儉、宋元強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下冊（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599。

將討論重點由「城」轉移到「市」，因此，其研究範圍不再以作為政治中心的首都為主，甚至也突破了初級性縣城的底線，而將其討論對象向下延伸到並非統治據點，連城牆的建築都沒有，²⁵卻有頻繁市場活動的市鎮。如此，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徑，由於強調重點的異趣，也造成「城市」範圍界定上的差別。在對「城」的強調下，城市依循行政等級來區分，從都城到縣城有清楚的層級劃分，縣城以下則在「城」市範圍之外；然而，在「市」的觀點下，則可發現許多縣級以下，非行政（軍事）據點的市鎮，其重要性——市場活動的頻繁——卻更甚於縣城（甚至更高級的行政據點）。要之，經濟史脈絡下的城市史研究與政治史範疇下的城市史研究，不只是研究焦點上的孰重孰輕，在相異的視角下，對城市的範圍界定也形成不同的圖像，而這樣的差別，就城市史的研究而言，則意味著城市研究視野的擴大。

從 50 年代中期開始，在「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下，城市工商業的活動常被用來證實資本主義的萌芽，或者將工商業城市視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前哨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思考傾向。在這種認知傾向下，明清城市史研究重點也就在於對資本主義性質的探究。這個時期的論文可以說是社會經濟史脈絡下城市史研究的開端，而在此開端時期的討論重點乃在於如何將城市問題編織進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中。因此，在此時期有關城市的討論中，最常被注意到的是城市手工業生產型態（生產關係）的判定問題，參與論戰的重要學者，如傅衣凌、鄧拓、翦伯贊、尚鉞、黎澍、黃佩瑾、韓大成……等人的著作，都或淺或深地涉及此議題，甚至以此為討論重點。²⁶ 這些討論多將工商城市

²⁵ 當然，城牆之有無也不能作為行政城市的基準，因為實際有不少縣城並無城牆的建築，不過，大體而言，在概念上縣級以上的行政機構是被認為應該要有城牆設備的。關於地方政府的築城問題可參考徐泓，〈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學院主辦，「史學、社會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臺北，1997 年 5 月 2-4 日）。

²⁶ 鄧拓，〈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原刊《人民日報》，1955 年 1 月 9 日，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69-90。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5：2，頁 79-124，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頁 338-400。尚鉞，〈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歷史研究》，1955：3，頁 85-134。尚鉞，〈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的停滯、變化和發展〉，分別載於《教學與研究》，第 6、7 期（1955），頁 28-42；頁 29-37，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

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的指標，同時，隨著議題的深入，相關討論也越涉入城市內部，將其視角透入城市中工商活動的具體情形，由此開啟城市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取徑，以至試圖由此建構出一個有別於政治規劃的「經濟版」的城市圖像。這種論述取向綿延甚久，即使「資本主義萌芽」論說已經不再流行後，仍有學者關注此議題。傅衣凌高足李伯重在世紀之交，猶重拾恩師舊論，撰有〈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一文，強調傅氏深具銳見，其所謂「蘇杭型城市」之出現確實是明清城市發展的重要特色。²⁷由此亦可見社會經濟的探究始終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基礎。

（一）城市中的工商形態——牙行、店鋪與行會

在資本主義萌芽討論初期，確定了城市工商發展的歷史意義後，城市內部的各種經濟活動樣態及其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諸如：行會性質、牙行的作用，乃至市民暴動也逐漸受到注意，成為明清城市史研究的新議題，經由這些議題的討論，「城市社會」乃逐步成形。

黎澍在〈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文中認為，萌芽說者誤認非商品生產為商品生產，將農奴式勞動當作雇傭勞動，把農村副業和家庭手

論集》，上冊，頁 160-237。鄧、翦、尚鉞三人的文章可以說是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奠基之作，而他們的論著也多在強調城市在「資本主義的萌芽」中有重要的生產性意義。尤其翦文更純熟地運用馬克思的概念，全面且邏輯清楚地建立起來一個「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體系。在此體系下，他給明清城市一個明確的定位，在其討論中，工商業城市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前哨站，它們既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根源地，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具體展現。而黎澍則堅決地站在相對的立場上，對萌芽說提出尖銳的質疑，因而激發相關討論的深化，其〈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一文認定：明清城市的政治意義還是甚於其經濟意義，它們並沒有真正成為新的社會型態的發展據點——該文原載《歷史研究》，1956：4，頁 1-25，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下冊，頁 742-780。黎文發表後，韓大成與傅衣凌先後為文重申城市的工商機能：韓大成，〈對黎澍同志「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一文的幾點意見〉，《歷史研究》，1956：7，頁 63-78。傅衣凌，〈論明清時代的棉布字號〉，《光明日報》，1956 年 8 月 16 日第 3 版，收入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頁 154。

²⁷ 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上、中、下）〉，分別載於《清史研究》，2001：3，頁 9-22；2002：1，頁 62-70；2002：2，頁 9-16。

工業當作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²⁸面對這個根本性的質疑，主萌芽說者紛紛撰文反駁，而為反駁此種全面性的否定，乃將探討觸角深入城市中，探究其工商活動之實況。傅衣凌首先寫了〈論明清時代的棉布字號〉，針對黎澍所謂中國的棉織業未曾出現「包買主」的觀點提出反駁，文中列舉史料證明「明代江南的布號，在經營牙行式的收購業務之外，也開始從事包買主的活動。」²⁹不過，牙行是不是具有包買主的性質卻又有疑義；劉重日、左雲鵬故而寫作〈對「牙人」、「牙行」的初步探討〉對此進行討論；³⁰這些問題的思考到 80 年代又再延續下去。80 年代初，徐新吾所撰的〈商人資本在棉手工業中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即可說是直接承接他問傅衣凌的問題，進行更為周延的討論。³¹在此同時，牙行或包買的問題，也成為明清史研究的開展議題之一，陸續有文章對此進行討論。³²

包買主的存在與否涉及到的根本問題是：商業資本是否介入產業的問題，而商業資本的流向是探究資本主義發展情況的一個重要論述。在此視角下，城市中的店鋪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考察對象。翦伯贊的〈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一文中即考察《紅樓夢》所提及商人設立的店鋪，試圖由此追查商業資本的走

²⁸ 黎澍，〈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原載《歷史研究》，1956：4，頁 1-25，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頁 742-780。

²⁹ 傅衣凌，〈論明清時代的棉布字號〉，《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頁 152-156。

³⁰ 劉重日、左雲鵬，〈對「牙人」、「牙行」的初步探討〉，原載《文史哲》，1957：8，頁 33-40，收入谷風出版社編輯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冊（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228-250。

³¹ 徐新吾，〈商人資本在棉手工業中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原載《鴉片戰爭前中國棉紡織手工業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 72-102，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下冊，頁 665-696。

³² 吳奇衍，〈清代前期牙行制度試述〉，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 6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6-52。韓大成，〈明代牙行淺論〉，《社會科學戰線》，1986：2，頁 153-161。劉敏，〈商人包買主產生的歷史條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3，頁 53-59+83。陳忠平，〈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牙人與牙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2，頁 31-38。楊其民，〈買賣中間商人「牙人」、「牙行」的歷史演變：兼釋新發現的《嘉靖牙帖》〉，《史林》，1994：4，頁 8-13。

向。³³事實上，明清城市中店鋪的林立，本來常被用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表徵，不過，在這種觀察角度下，這些店鋪往往只是被當作一種指標，藉強調其數量、種類、規模，來說明、凸顯城市的繁榮而已。如今在商業資本流向的追查下，乃更進一步對這些店鋪的實際營業狀況進行考察，尤其強調封建勢力對於商業資本的阻礙。唐文基的〈明代的鋪戶及其買辦制度〉探討明代城鎮中店鋪的成立情形，尤其著重於政府如何以「買辦」制度徵求這些鋪戶，進而論斷「買辦制度是商業資本發展的障礙」。³⁴趙毅的〈鋪戶、商役與明代城市經濟〉則討論鋪行的商役如何因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演變，進而探討其對城市經濟的影響。³⁵除民間所設之商店外，明代中期以後，官員權貴乃至皇家也投入店鋪的經營，對於這些特殊形式的店鋪的探討，則有鄭克晟的〈明代的官店、權貴私店和皇店〉與韓大成的〈明代的官店與皇店〉、〈明代權貴經營的工商業〉，他們基本上認為這種店鋪是種惡質的封建勢力，有礙商業資本的發展。³⁶這些論文將對商業資本的考察著落為具體的店鋪發展問題，就城市史的研究而言，這種研究取徑更深入城市內部，其研究成果提供具體了解其中商業活動的「制度性」基礎。

牙行與店鋪可以說是構成城市商業有機體的細胞，對這方面的考察，可以提供了解城市經濟活動的基礎。除此之外，要進一步動態性地掌握城市工商業的實際活動情形，則須對其中的「行會」問題加以考察。

在「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中，行會的性質很早就被觸及，且成為爭議的焦點。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論及城市工商業的發展障礙時即言：「很多資料證明當時各城市的商人都有自己的行會。……不過，當時的商業行會大半控制

³³ 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頁 389-390。

³⁴ 唐文基，〈明代的鋪戶及其買辦制度〉，《歷史研究》，1983：5，頁 140-150。

³⁵ 趙毅，〈鋪戶、商役與明代城市經濟〉，《東北師大學報》，1985：4，頁 34-40。

³⁶ 鄭克晟，〈明代的官店、權貴私店和皇店〉，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 1 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頁 173-184。韓大成，〈明代的官店與皇店〉，《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4，頁 30-35。韓大成，〈明代權貴經營的工商業〉，收入氏著，《明代社會經濟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356-394。

在官僚地主商人手裡，……當他們把行會控制在自己手裡以後，就迫使行會替封建主義服務。」³⁷之後，尚鉞的〈清代前期中國社會之停滯、變化和發展〉³⁸、彭澤益的〈《織工對》史料能說明中國手工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嗎？〉³⁹及孔經緯的〈中國封建社會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⁴⁰，也都涉及行會的存在與性質問題。不過，這些討論大都點到為止，直到黎澍以行會為議題，針對尚鉞的萌芽說提出質疑時，行會才成為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中的重要議題。黎澍在〈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中即已斷言：「行會制度是與資本主義經營相反對的制度。只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才可能被突破，並使得在它控制下的手工工場成為資本主義的。」⁴¹之後又在〈中國的近代始於何時？〉一文中強調，鴉片戰爭前中國手工業受限於行會，所以不可

³⁷ 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頁 389-390。

³⁸ 尚鉞，〈清代前期中國社會之停滯、變化和發展〉中說：江南廣大地區上立起來的三合會及其支派和哥老會等秘密結社「是明末市民運動，特別是織工運動，在新的條件下的新發展起來的適應新鬥爭的新形式。……因此，這些秘密結社所反映的社會關係，卻是萌芽的資本主義關係，而不是封建的行會。不過，當時的中國社會仍然是封建社會，他們不能超越他們的歷史條件，所以就他們的組織成員及其身分上看，是超出了封建的階級、行會乃至師徒等隸屬關係的限制。」——原載於《教學與研究》1955：6-7，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頁 229-230。

³⁹ 彭澤益，〈《織工對》史料能說明中國手工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嗎？兼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運用史料與論證方法上存在的問題〉中言：「中國商業行會和手工業行會的起源時期，尚待考索。但在隋唐時已有行會組織。（頁 414）……根據手工業行會制度的歷史證明，只要有行會組織的行業和地方，這種行會強制的力量必然存在並發生它應有的作用。」——原載《經濟研究》，1958：4，頁 75-88；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上冊，頁 405-432。

⁴⁰ 孔經緯，〈中國封建社會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文中認為南宋臨安城市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而且「這種市民等級經濟力量的成長，使（南宋）臨安的行會組織較前增多，工商行業大抵各有其行會或公會組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行會或公會還沒有達到束縛普通工商業者發展的地步，而是起著保護作用的。（頁 347-348）當然，南宋的資本主義萌芽可能尚在封建行會的束縛和支配之下（在臨安，已看到了這種情況），但這對資本主義萌芽的初期情況來說也是不可避免的。」（頁 350）——原載《新史學通訊》，1955：12，頁 3-7，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上冊，頁 339-362。

⁴¹ 黎澍，〈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原載《歷史研究》，1956：4，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上冊，頁 381。

能發展突破家庭手工業的生產型態而發生資本主義萌芽，⁴²面對黎澍的批評，尚鉞在〈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二三事〉中提出反駁，他在這篇文章中花了相當的篇幅對 17—19 世紀中葉的行會進行考察後，認為：「從中國行會這一系列的發展情形看，嚴格地具體分析起來，行會『限制經營』與阻礙手工業發展，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卻恰好反映出，隨著市場的擴大，交換關係的發展所引起的自由競爭的發展，又反轉來影響到行會的發展。」⁴³且不論個別的觀點如何，由上述的議論顯示：隨著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深入，行會的問題乃逐漸浮現出來，而成為重要的議題。

關於中國傳統社會的「行會」問題的探討並非始於 1950 年代，事實上，早在 20 年代即有部分中日學者提出相關論文，⁴⁴所以，行會問題的討論不能說是因資本主義萌芽才開始的。不過，二〇、三〇年代的這些著作主要以唐宋時期為主，本少著意於明清，且其研究概念傾向於將中國行會與歐洲十一至十九世紀的「guild」組織相比附，因而在研究視野上不免失之偏差，以致未能真正掌握明清行會的特殊性，⁴⁵明清工商團體研究的真正開展，應該說

⁴² 黎澍，〈中國的近代始於何時？〉，原載《歷史研究》，1959：3，頁 1-11，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 354-370。

⁴³ 尚鉞，〈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二三事〉，《歷史研究》，1959：7，頁 25-50，收入氏著，《尚鉞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418。

⁴⁴ 1922 年日本學者和田清發表〈會館公所の起原に就いて〉，《史學雜誌》，33：10（1922），頁 808-811。1925 年鄭鴻笙發表〈中國工商業公會及會館、公所制度概論〉，《國聞周報》，2：19（1925），頁 19-21。同一年加藤繁發表〈唐宋時代の商人組合「行」に就いて〉，收入白鳥博士還曆記念編委會編，《白鳥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25），頁 293-350。至 30 年代中國學者鞠清遠所著之《唐宋官私工業》（臺北：食貨出版社，1934 年初版，1978 年重印）已有專章討論行會，而稍後全漢昇出版《中國行會制度》（臺北：食貨出版社，1935 年上海版，1978 年重印）之專著。這些論文算是這方面研究的起步。關於這方面的回顧可參邱澎生，第一章〈導言〉，《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0），頁 1-20、邱澎生，〈導論〉，〈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頁 1-19、王日根，〈緒論：令人夢斷魂牽的鄉土情結〉，《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 1-25。

⁴⁵ 參邱澎生，第一章〈導言〉部分，《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頁 1-20。

還是從「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開始的。

在黎澍對尚鉞的「萌芽」說提出質疑後，擁護「萌芽」說者開始對「行會」作更深入的探討，試圖藉此反駁黎澍的觀點，行會研究也因此開啟新視野。1958年在尚鉞還未對黎澍提出正式反駁之前，劉永成即發表〈解釋幾個有關行會的碑文〉，質疑黎澍所謂行會只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才可能被突破的說法，他經由史料來說明：「由於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商品經濟的活躍，手工業作坊的數目日益增多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行會本身也不斷起了許多變化。」⁴⁶相隔約一年後，他又寫作〈試論清代蘇州手工業行會〉，這篇文章更利用大量的碑刻資料——此時《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已出版——對行會問題作更深入的討論，以此呼應鄧拓〈從萬曆到乾隆：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個論證〉的說法，⁴⁷更確認了明清之間——尤其是從萬曆到乾隆期間，中國城市工商經濟已高度發展，且促成了行會的變化。劉文的討論開啟了思考明清行會變化的研究取徑。此後，劉永成又與赫治清合著〈論我國行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進一步申論其說，⁴⁸而李華、杜黎、呂作燮、彭雨新、彭澤益、傅築夫、洪煥椿諸人，也陸續對明清行會問題進行討論。⁴⁹且不論其個別觀點如何，這些研究已經以明清行會為主要討論對象，

⁴⁶ 劉永成，〈解釋幾個有關行會的碑文〉，《歷史研究》，1958：9，頁 63-70，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頁 491。

⁴⁷ 劉永成，〈試論清代蘇州手工業行會〉，《歷史研究》，1959：11，頁 21-46。鄧拓，〈從萬曆到乾隆：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個論證〉，《歷史研究》，1956：10，頁 1-31，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頁 133-182。此文主要利用北京附近門頭溝的廠礦契約、文書為資料，試圖由此證實「從明朝萬曆年間到清朝乾隆年間，約當公元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時期。」（頁 133）。

⁴⁸ 劉永成、赫治清，〈論我國行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頁 117-140。

⁴⁹ 彭雨新，〈明清時期的鋪戶作坊和資本主義萌芽〉，《江漢學報》，1962：5，頁 36-42，收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冊，頁 251-268。彭澤益，〈鴉片戰爭前清代蘇州絲織業生產關係的形式與性質〉，《經濟研究》，1963：10，頁 63-73；收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冊，頁 428-456。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歷史研究》，1978：4，頁 63-79，收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冊，頁 269-304。杜黎，〈鴉片戰爭前上海行會性質之嬗變〉，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頁 141-171。呂作燮，〈試論明清時期會館的性

試圖深入掌握其發展的特色。在此同時，相關的史料整理也由此展開：1959年《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出版，之後《上海碑刻資料選集》（1980）、《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1981）、《嘉興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1985）陸續編輯出版，這些資料的整理擴充相關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所開展的研究，更深入明清城市內部工商業活動的運作情形。

行會的研究中隱含著城市概念的轉變。對明清行會變化的強調，事實上意味著：城市已不只是伸展政治權力的憑藉，而且是個經濟活動的場域，甚至，它本身就是一個相應於工商業發展而不斷自我調整的有機體。或者，在某種角度下也可以說：行會的研究是試圖透過工商業的組織活動來建構城市本身的發展邏輯。

（二）「市民階級」的成立——市民暴動

牙行、鋪戶與行會的研究將觀察城市的視野由政治領域轉向經濟領域，透過這些研究，城市呈顯出不同的面貌。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這些研究是「城市社會」的建構工作，而這個建構工作真正到達高峰是所謂「市民階級」的提出。

市民暴動的議題早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初期就受到注意，如前所論，傅衣凌在《紅樓夢》社會背景的討論之前即已寫作〈明代蘇州織工、江西陶工反封建鬥爭史料類輯〉一文。這篇文章不只開創市民暴動的議題，同時認定這是城市工場手工業發展的結果，將此議題扣上「反封建」的主題，因而成為議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先行之作。此後，他繼續擴充史料、伸展討論範圍，又寫作〈明代江南的紡織工業與織工暴動〉、〈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在這些文章中，傅衣凌越來越擴大討論的對象，並越來越明確地標舉出「市民階層（級）」的概念——在〈明代蘇州織工、

質和作用〉，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頁172-211。洪煥椿，〈明清蘇州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初步考察：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剖析〉（寫於1980年1月），收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下冊，頁494-555、〈論明清蘇州地區會館的性質及其作用：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剖析之一〉，《中國史研究》，1980：2，頁3-15。彭澤益，〈中國行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88：6，頁3-19。

江西陶工反封建鬥爭史料類輯》一文中，他主要針對他所謂的「手工業勞動者」進行考察，而在〈明代江南的紡織工業與織工暴動〉文中，他則說「嘉靖以後江南社會矛盾尖銳化，參加鬥爭的人物，除了農民之外，還有廣大的市民階層。」⁵⁰而至〈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一文中，他更將士人階層的反對考試不公、封建負擔、貪官汙吏、閹官暴行以及要求地價合理的諸種抗爭活動，皆籠統地視為市民階級的反封建鬥爭，他且明言：「江南城鎮商品經濟的發達，工商業人口的增長，這樣，就大大的擴大城鎮市民階層的队伍，改變城鎮的社會階級關係。」⁵¹如此，他明確地斷言明清城市（市鎮）已出現新的階級關係，是一個有別於農村的社會型態。傅氏之外，劉炎的〈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中，也將士人涵蓋於「市民階級」中，並斷言明末城市的民變有別於農民鬥爭，其興起是「由於封建社會的日益沒落，城市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發展，新興市民階級的成長，反映在社會階級鬥爭上就出現了明末連續發生的城市『民變』，反映在思想意識上就表現為明末反理學思潮和民主主義的啟蒙思想的泛濫。」⁵²（這種說法中已暗示著城市已經成了一個社會文化發展的場域）。由於實際參與市民暴動的群眾並不限於手工業者，所以有部分討論乃進一步將「市民階級」區分為「中等階級」與平民反對派，例如尚鉞的〈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即謂：市民運動中的「『士民』即中等階級，其他大抵都屬於平民反對派。」⁵³而左雲鵬、劉重日的〈明代東林黨爭的社會背景及其與市民運動的關係〉中也說萬曆年間的反礦稅暴動是「城市中等階級與平民反對派，反對封建特權的爭鬥。」⁵⁴此外，齊功民的〈明末市民反封建鬥爭〉一文也強調當時社會上

⁵⁰ 傅衣凌，〈明代江南的紡織工業與織工暴動〉，收入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104。

⁵¹ 傅衣凌，〈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頁129。

⁵² 劉炎，〈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原載《歷史研究》，1955：6，頁29-59，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下冊，頁616。

⁵³ 尚鉞，〈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歷史研究》，1955：3，頁85-134。

⁵⁴ 左雲鵬、劉重日，〈明代東林黨爭的社會背景及其與市民運動的關係〉，《新建設》，1957：10，頁33-38，另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頁255-272。

已出現「市民階級的成長」，且因此而有市民運動。⁵⁵這些作品試圖藉用「階級」概念來理解城市民變，他們肯定明清工商業的發展已經造成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其中已有「市民階級」的構成——乃至其中已分化為兩個階級，這些市民階級與封建勢力的對立是促成民變的結構性因素。

如前所言，這些作品對於「階級」概念的運用並不精確，其所謂的「市民階級」事實上相當含混籠統，尤其在史料選用與解釋上又難免有化約或以偏概全，乃至牽強附會之嫌；故而早在 50 年代此理解概念提出未久，即有反對的意見出現——吳大琨即針對尚鉞的觀點提出批判，認為「中國缺乏一個獨立存在的『市民階級』」，不可將城市居民聯合反封建皇權的鬥爭，等同於歐洲的『市民動亂』。⁵⁶這樣的質疑在 50 年代大體上可說是「非主流」的聲音。不過，由於「市民階級」概念本身的含混籠統，及概念與史料之不盡吻合，即使贊同資本主義萌芽說者，行文間有時也不免有所保留。⁵⁷到了 80 年代，部分大陸學者在討論城市民變時，已不再堅持「市民階級」概念。例如

⁵⁵ 齊功民，〈明末市民反封建鬥爭〉，《文史哲》，1957：2，頁 38-46。

⁵⁶ 吳大琨在〈評〈明清之際中國市民運動的特徵及其發展〉〉中說：「中國缺乏一個獨立存在的『市民階級』，這恰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特點，而構成這個特點的原因恰恰又是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密切相關的。……我認為尚鉞同志在這篇文章中所詳細描繪的『市民動亂』，實際上就只是明末城裡的封建知識分子與封建手工業者、中、小商人反對當時的極端暴虐的封建皇權的鬥爭。當然，這些人都住在城市裡，他們與工商業有關，他們與農民不同，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它們的爭鬥仍然是當時整個中國農民動亂中的一個支流，而決不是與歐洲同樣性質的什麼『市民動亂』。」（頁 280）——該文寫於 1959 年 9 月 13 日，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頁 273-283。

⁵⁷ 汪槐齡在〈明萬曆年間的市民運動〉中雖認為：「城市『民變』中，可顯然地看出，萬曆年間的中國封建社會內，已經出現了一股不同於農民的新的社會力量，采取了不同於農民起義的方式。這說明了當時中國封建社會內的階級關係已逐漸發生變化。」（頁 25）。但他也認為這些城市民變，並不同於西歐的市民運動。因為當時的工商業者、手工業僱傭工人「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來說，雖已逐漸成長，但還未壯大到各自形成一個新的獨立的階級。」（頁 27）——該文發表於《歷史教學》，1959：6，頁 23-27。除此，1959 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尚鉞與鄭昌淦主持下，舉行「明清之際中國市民運動的特徵及發展」的討論會，會中雖「大多數人認為在明中葉以後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對於「市民運動」的性質仍頗有爭議，有人認為「市民不能說是階級，而是一個等級，從城市的有產者到流氓無產階級的各種萌芽，都可稱為市民。」這種疑義多少也顯示當時學者對「階級」概念之使用心有未安。此會議之概況參見〈中國人民大學討論《明清之際中國市民運動的特徵及其發展》〉（《新建設》，1959：6，頁 63-64。）一文的介紹。

1982 年劉志琴所發表的〈試論萬曆民變〉一文即認為：「萬曆民變是發生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歷史背景中，人們襲用西方市民運動的眼光來看待它，認為這是新興的市民階級的運動，或地主階級反對派的鬥爭，這種見解並不符合歷史實際。」他斷言：「明末的市民在政治上還不足以構成新的社會力量，離形成新的階級還相當遙遠。」⁵⁸這除了個人立場上的不同外，在相當程度上也可說是整體「階級」概念運用上的自我修正。⁵⁹

城市中是否存在著「市民階級」，事實上意味著城市是不是一個有別於農村的社會型態。也就是說，「市民階級」的存在與否決定著「城市社會」之是否存在，而「城市社會」的存在與否又多少影響到「資本主義萌芽」之是否顯著。因為按照邏輯上來說，「資本主義萌芽」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而在新的生產關係下理應出現新的「階級」，一旦出現新的階級則可說社會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如此，則可說已出現新的「社會型態」。所以，既然要強調明清間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而城市又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前哨站，那麼，進一步強調城市中已形成「市民階級」，藉此以斷定城市有別於尚未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農村，而已自成一特殊之社會型態，實是理所應然，因此，在民變中確認市民階級的存在，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萌芽討論自然發展的結果。就城市史研究來說，這些關於「市民階級」的討論，事實上也正可說是致力於建構「城市社會」的一種努力。不過，由於其所憑藉的手段——「階級」概念在前提上的定義就頗為含混，而在運用的過程中又任意擴充其意涵。所以，由此推衍出來的「市民階級」也就僅是一個籠統含混的名詞，從而「城市社會」也無著力之處。⁶⁰

⁵⁸ 劉志琴，〈試論萬曆民變〉，收入《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678-697。

⁵⁹ 關於民變的研究，臺灣學者也有相關論述：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這是他 1996 年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此專論可說是傅衣凌以來相關討論的總結，除了史料上更求周全外，在觀點上也避開階級鬥爭的概念，這可說是時代與環境差異所致。

⁶⁰ 參與城市民變的群眾不必然具有「市民意識」，甚至也不可隨意稱之為「市民運動」，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Richard Von Glahn, "Municipal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Jiangn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2(1991): 280-307.

（三）紳民關係中的城市社會

相對於大陸學者的積極套用階級觀念以理解民變，乃至由此建構城市社會的作法，日本學者在五〇、六〇年代雖也受到馬克思理論的影響，⁶¹但他們在討論上毋寧更傾向於將市民暴動問題置於士大夫與民眾的關係下思考，而關於城市社會的建構也由此出發。早在 1951 年宮崎市定發表的〈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輕工業の發達〉文章中，就已涉及城市民變的問題。⁶²不過他尚未清楚地對此提出解釋。三年後他又發表〈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素描の試み〉，文中他明確地將民變的問題納在士大夫與民眾的思考脈絡下。這篇文章不僅對民變提出極富社會文化意義的解釋，也為城市建構出一個極豐富的社會文化圖像——事實上，宮崎氏寫作這篇文章有極宏偉的意圖，他聚焦於蘇州城，據此將「社會構成與文化聯繫起來進行綜合性的考察」。⁶³宮崎市定這篇文章為城市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立下一個極佳的典範。之後，日本的明清史學者雖未完全承繼宮崎氏這種強調社會文化史的討論立場，而將重點側重在經濟面向，⁶⁴不過，他們多也還將城市民變納在紳民關係的脈絡下思考，例如：佐伯有一、栗林宣夫、夫馬進、森正夫、川勝守、岸本美緒……等人的討論，多傾向於以紳民之間的經濟矛盾來解釋民變的發生。⁶⁵這樣的

⁶¹ 橫山英，〈中國における商工業労働者の發達と役割：明末における蘇州を中心として〉，《歴史學研究》，160（1952），頁 1-13。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收入《世界の歴史》，第 11 冊（東京：筑摩書房，1960），頁 41-80。這兩篇論文大概是最接近馬克思理論的著作，不過，兩者都以亞細亞專制的概念來解釋民變問題，兩者也都認為當時暴動者的階級意識並不成熟。

⁶² 宮崎市定，〈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輕工業の發達〉，《東方學》，2（1951），頁 64-73。

⁶³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素描の試み〉，《史林》，37：3（1954），頁 1-33。

⁶⁴ 參于志嘉，〈日本明清史學界對「士大夫與民眾」問題之研究〉，《新史學》，4：4（1993），頁 141-175。

⁶⁵ 佐伯有一，〈明末董氏の變：所謂「奴變」の性格に關連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6：1（1957），頁 26-57。譯文見佐伯有一著，樂成顯譯，〈明末董氏之變〉，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304-340。佐伯有一，〈一六〇一年「織傭之變をめぐる諸問題：その一」〉，《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45 冊（1968），頁 77-108。栗林宣夫，〈萬曆十年の杭州民變について〉，《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76），頁 223-234。夫馬進，〈明末の都市改革と杭州民變〉，《東方學報》，49（1977），

解釋雖然偏離宮崎氏對紳民精神結合的強調，但他們這些討論的背後大體上都還以士大夫與民眾關係為主軸來架構「城市社會」，而這個概念架構基本上是承襲自宮崎氏。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日本學者是以士大夫與民眾對立或結合為主軸建立起城市社會，而由此基本架構延伸出來相關的研究後來更擴及慈善機構與無賴階層的探究。如夫馬進對民間性慈善機構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這些研究已指向地方公議、地方社會的成立問題上。⁶⁶川勝守與上田信則對城市中「無賴」進行討論，尤其川勝守由「都市的社會結構」出發，逐步深入追查下層民眾的活動跡象，希望由此建構一個面向較廣的城市社會。⁶⁷除日本學者外，臺灣的梁其姿也對此類研究投入甚深，自 1984 發表〈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一文後，陸續對明清慈善組織進行考察，⁶⁸最後將其考

頁 215-262。森正夫，〈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會の反亂について〉，《中山八郎教授頌壽記念明清史論叢》（東京：燎原書店，1977），頁 195-232。川勝守，〈明末・南京兵士の叛亂：明末の都市構造について素描〉，《星博士退官記念中國史論集》（山形市：星斌夫先生退官記念事業會，1964），頁 187-208。森正夫，〈奴變と抗租：明末清初を中心とする、華中・華南の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民衆の抵抗運動〉（名古屋：昭和 54・55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 C)「抗租運動の長期的比較的綜合的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1981）。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東方學報》，52（1980），頁 595-622。岸本美緒，〈「五人」像の成立〉，收於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 503-534。

⁶⁶ 夫馬進，〈同善會小史〉，《史林》，65：4（1982），頁 511-550。夫馬進，〈善會、善堂の出發〉，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頁 189-232。夫馬進，〈清代前期の育嬰事業〉，《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11（1986），頁 5-41。夫馬進，〈清末の保嬰會〉，收入《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第 5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163-190。

⁶⁷ 川勝守，〈中国近世都市の社会構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について〉，《史潮》，6（1979），頁 65-90。川勝守，〈明末清初の訟師について：旧中国社会における無賴知識人の一形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9（1981），頁 111-130。川勝守，〈明末清初における打行と訪行：旧中国社会における無賴の諸史料〉，《史淵》，119（1982），頁 65-92。川勝守，〈江南市鎮の生産・流通・消費の歴史的位置：手工業生産と無賴・棍徒・脚夫〉，《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6（1998），頁 1-28。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無賴」をめぐる社会關係：打行と脚夫〉，《史學雜誌》，90：11（1981），頁 1619-1653。

⁶⁸ 梁其姿，〈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收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國海洋發展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頁 97-130。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間慈善活動的興起：以江

察成果彙集成《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一書。⁶⁹這本書（及之前的相關論文）的思考幅度相當廣，除具體社會組織的考察外，更涉及諸多相關思想觀念的探討，且隱然指向地方社會的構成或運作的問題。這樣的研究為明清社會文化的思考開闢了一個更為廣大、多樣的想像空間。

就城市史的研究而言，這類延伸性議題的開發也更豐富了城市社會的意涵，而且，相較於「民變」研究從非常性的事件出發，再因鬥爭而找尋肇因，因而以階級或階層間的矛盾關係來理解城市社會；這些研究從一般性的社會活動出發，思考日常的城市社會運作的邏輯，由此所建構起來的社會結構應該更為確實深刻。要之，這個思考方向在城市史的研究上，應該是個極具發展性的研究取徑。不過，這些研究大體而言並非以城市為主體，它們甚至可以說只是以城市為背景，城市本身的特性較少受到重視。

三、城市生活與社會風氣的探討

明清城市史研究的真正盛行大概要到 1980 年以後，在此之前，固然不乏涉及城市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大多只是針對城市的局部性議題展開探討，而少以城市之整體為研究對象。如前所論，「資本主義萌芽」視野下的城市研究，固然可能在某些角度上相當深入城市內部，但不免偏執一隅，未見城市之全貌。或者說，這是以城市為背景，或涉及城市的研究，而不是有意識地以城市整體為對象的研究。也就是說，50 年代到 80 年代之前，中國大陸學者的城市史是以資本主義萌芽為主題，為伸展這個主題而涉入城市領域的研究，真正以城市為主體，對其進行全面性考察的研究，要到 80 年代以後才真正開始。

中國大陸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走向經濟改革開放的路徑，在此路徑

浙地區為例》，《食貨月刊》，15：7・8 合刊（1986），頁 304-331。梁其姿，〈清代慈善機構與官僚層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6（1989），頁 85-103。梁其姿，〈清代的惜字會〉，《新史學》，5：2（1994），頁 83-115。

⁶⁹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下，城市（市鎮）經濟隨之日漸活絡，⁷⁰至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且明確指出：「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只有堅決地系統地進行改革，城市經濟才能旺盛繁榮，才能適應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需要，真正起到應有的主導作用，推動整個國民經濟更快地發展。」⁷¹如此，城市的重要性又成了經濟改革、開放的重點。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城市史的研究乃蔚為熱潮——這種學術研究與現實的關聯性可以由《中國城市史叢書》編委會的申明略窺一二，其謂：

為了宣傳中國城市建設的成就；為了弘揚中國的城市文明；為了推動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同時，為了我國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以及城市現代化和鄉村城市化提供歷史的借鑒和依據，開展中國城市史的研究是有現實意義的。⁷²

當然不一定所有的研究都如此處所言一般，是出於現實目的。不過，中國城市（市鎮）經濟的活絡應是相關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刺激因素。客觀的事實顯示：1980 年代以來，城市（市鎮）史為主題的研究確實盛極一時，這種盛況可以由相關書籍的出版見其大概：80 年代以城市為主題的明清城市史研究，可以傅崇蘭的《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郭蘊靜主編的《天津古代城市發展史》

⁷⁰ 參李福鐘，〈到改革開放之路〉，《改造一個共和國》（臺北：稻鄉出版社，1993），頁 103-127。

⁷¹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 1984 年 10 月 20 日通過）〉，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768。

⁷² 程子良、李清根主編，〈前言〉，《中國城市史叢書：開封城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頁 5。此外，樊樹志也表示：「促使我選擇江南市鎮這一課題進行研究的動因，在於它不僅具有歷史價值還具有現實價值。市鎮在鄉村的都市化趨勢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這種歷史的啟示對於當代城市與鄉村的建設，以及城鄉差別的縮小，是有借鑑意義的。」——樊樹志，〈緒論〉，《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頁 12。陳學文在《嘉興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前言〉中也呼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為了適應城鄉經濟發展的作用，促進城鄉物質交流，發揮城鎮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必須對城（市）鎮的發展過程進行研究，汲取歷史的經驗，發揚我國城鎮建設的好傳統。」（頁 3）。

及韓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為代表。這三部著作分別在 80 年代的前後期成書，其出版也為明清城市史研究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理解基礎。⁷³除此之外，至 1990 年代，城市史叢書的出版更足以反映城市史研究的熱門——除了前所提及的《中國城市史叢書》外，另有《中國古代城市生活長卷叢書》的編輯。《中國城市史叢書》是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 1992 年所編纂，此叢書選定某些重點城市，自古至今作縱貫性的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生活長卷叢書》則由湖南出版社於 1996 年編成，其中宋代的部分——《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早在 1993 年即已出版；此叢書依時代分冊，對同一時代內之城市作全面性的敘述。城市史叢書的編輯外，也不乏通論性城市史專書的出版，如：何一民的《中國城市史綱》、戴均良主編的《中國城市發展史》、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⁷⁴至於縣城以下的市鎮，其研究之盛更不下於一般大城市，所出版之專書即有：劉石吉的《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樊樹志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陳學文的《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蔣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⁷⁵甚至個別專業市鎮也有專門研究成書者，如：梁森泰的《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羅一星的《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⁷⁶另外，陳學文除了從事相關討論外，更先後編寫了兩

⁷³ 傅崇蘭，《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後記言：「從一九七九年確定選題到一九八一年初，我翻閱了一些地方志和其他資料……我在三年之中，斷斷續續地考察了九個運河城市。」（頁 431）郭蘊靜主編的《天津古代城市發展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其〈說明〉記：「本書編寫工作始於 1985 年。……全書分上下兩編，共十三章，以明清時期為主線，尤以明清經濟為重點。」（頁 1）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序繫年於 1989 年 2 月。

⁷⁴ 何一民，《中國城市史綱》（成都：四川大學，1994）。戴均良主編，《中國城市發展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⁷⁵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劉石吉之書事實上寫成於 1974 年，是他在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所以並非市鎮史風潮下的作品，但其於此時出版，則可作為市鎮史風潮盛行之反映。

⁷⁶ 梁森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羅一星，《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部重要的史料集：《嘉興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與《湖州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⁷⁷ 這些有關城市（市鎮）史專書的編寫、出版，顯示城市史已經成為一個獨立且鮮明的研究主題。⁷⁸

在改革開放的風潮下，大陸學者也逐漸將其思考觸角伸出教條化的馬克思理論框架，試圖引進其他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與方法以為參考。尤其是 G. W. Skinner（施堅雅，1992-2008）關於中國市鎮結構的討論，自 70 年代以來已成中國城市（市鎮）研究的新典範，中外學者多有受其影響者，⁷⁹ 其影響力也在 80 年代開始擴及大陸學界。1980 年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聯會在北京召開「自宋至 1900 年中國社會及經濟史學術討論會」，Skinner 應邀參加，在會上發表〈市場及區域經濟的結構與發展〉，雖然中國學者一時難以掌握其論旨，但已刺激大陸學者從整體性的觀點去思考城鎮問題。⁸⁰ Skinner 到中國開會之前，中國地區的所有圖書館可能連一本他的著作都沒有，而在此會議之後，即開始有人介紹其著作。⁸¹ 至 80 年代中期左右，

⁷⁷ 《嘉興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編成於 1985 年 3 月，《湖州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成於 1989 年，兩書均未具出版資料。

⁷⁸ 關於市鎮史的研究回顧可參考：劉石吉，〈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綜論近年來大陸學界有關明清市鎮的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1988），頁 171-198。巫仁恕，〈明清近代市鎮墟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九州學刊》，5：3（1993），頁 95-112。陳學文，〈論江南市鎮史的研究〉，《九州學刊》，6：3（1994），頁 125-138。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9：3（1998），頁 87-134。

⁷⁹ 參考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87-134。

⁸⁰ 樊樹志曾參與該會，他在《明清江南市鎮探微》的〈緒論〉中頗推崇 Skinner 的研究方法，他且記道：「會中 Skinner 的觀點」使與會的中國學者感到生疏而難於理解。……這是由於長期來學術交流不暢，使我們對區域系統分析方法，以及運用區域研究方法研究市場經濟與城市化現象感到陌生的結果。」——樊樹志，〈緒論〉，收入氏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頁 2。

⁸¹ 陳橋驛說：「中國由於十年動亂時期中城市科學研究的停滯和對國際學術界交流的中斷，以我個人來說，到去年在北京讀到了從國外複製的本書（Skinner 所編著之 *The Late Imperial China*）書評，才第一次知道國際上已經有這樣一部歷史城市地理的巨著出版。更為遺憾的是，據我所知，直到最近，國內的任何一個圖書館中，都還不曾有此書的收藏。」（頁 34）——參陳橋驛，〈讀《中國王朝時代晚期的城市》的兩篇書評〉，《杭州大學學報》，1980：4，頁 34-37。

他的重要討論也已陸續譯為中文，乃至出版成書。⁸²在現實的推動以及新方法的刺激下，大陸學者城市史研究在 80 年代後，乃逐漸突破「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格局，而呈現出新的風貌。

在「資本主義萌芽」主題下的城市研究，往往執定某個經濟發展準則，以之為標尺，進出各城市（市鎮），對相關於此的諸種現象進行檢查。在這種研究取徑下，城市只是個背景，其個別性與整體特性往往被忽略。80 年代以來的明清城市史研究則以城市為主體，力求對城市作全面性的掌握。如傅崇蘭的《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作者自 79 年開始對運河沿岸的城市作考察，至 84 年寫成該書，這本書以運河沿岸的九個城市為主要研究對象，分為位置、環境、人口、經濟、文化五個部分（原本尚有「城鄉」部分），其體例相當完整——這之中也多少有現實意味，楊向奎在此書序言中說：「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新的城市會不斷出現，城市的選點、位置、環境、人口、經濟、文化都要考慮在內；因為城市是我們進行現代化的要區，一個城市的躍起可以帶動整個地區活躍起來，所以我們必須作各方面的考慮。」⁸³韓大成的個人寫作歷程更可看見主題轉換的痕跡，韓氏在「資本主義萌芽」討論初期，即在尚鉞指導下撰寫〈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文，收入尚鉞主編之《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中，此後在「資本主義萌芽」主題下，陸續涉及城市領域，撰寫相關文章。在 80 年代初期時完成《明代社會經濟初探》一書，⁸⁴在「資本主義萌芽」的主題下，探討明代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趨勢與封建阻力。到 80 年代後期則以城市為主題撰寫《明代城市研究》，這本書全面性地對明代的城市進行探討，對於城市的類型、發展

⁸² 施堅雅 (G.W. Skinner) 著，余華青、黃飛虎譯，〈中國城市與地方系統的等級〉，收入李范文、陳奇猷等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 1 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 96-192。施堅雅著，余華青、王東生譯，〈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收入李范文、陳奇猷等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 2 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1-58。施堅雅著，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⁸³ 楊向奎，〈《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序言〉，《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頁 1。

⁸⁴ 韓大成，《明代社會經濟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這本書的出版日期為 86 年，但其序言寫於 82 年，且序言中已概述書中各篇內容。所以，其成書應在 80 年代初期。

條件、內部情況……等等都有完整的陳述。其部分內容，如：牙行、官店與皇店、權貴勢要經商等，在此之前作者即已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思考命題下撰寫成文，在此被重新編收於城市史的主題中。⁸⁵這樣一個收編過程也多少顯示出主題轉換的意義，彰顯著城市史已經在資本主義萌芽之外，另成一獨立的研究主題。

當城市史研究真正以城市為主體，因而要求對城市進行整體性的探討時，城市史的研究視野也隨之更大幅度地開張，一些過去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思考下未曾留意到的城市現象，在新的城市史視野中被注意到了。這種視野的擴展也開發出城市史研究的新命題，甚至造成問題焦點的轉移，而在新的問題焦點下，城市概念也有所轉變。

傅崇蘭《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的寫作體例與內容可說正是一種以城市為主體的研究取向的代表，在此書中，作者首先對城市的基本構成因素——如位置、環境、人口等進行考察，這樣的考察賦予城市一個確實的存在基礎，讓城市具有個別性與整體性——它不像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下的城市研究那般只是行色匆匆地穿過不同城市，獵取相關的資料，再將之編織於特定的討論架構下。而對於經濟部分的探討，傅氏也幾乎放棄過去那種持定某些理論標準，無視個別條件與整體情境恣行「檢查」的寫作方式，他切實地進入各個城市，對其各種經濟活動實況進行具體的考察。在其敘述過程中，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概念性的詞彙已少見到。這種對「理論」的「保守」態度，讓它成為一部頗具「實證性」的作品，就理論的發展，這或許是種「退步」，但相較於之前的作品，它卻更深入城市之實況。

傅崇蘭的寫作態度與方式或許是開風氣之先，但並非特例，像他那般以實證性的態度對城市（市鎮）的基礎與活動內容進行全面性的考察，可以說是80年代以後城市史研究的主要趨勢，前所列舉的相關著作多有此傾向，如陳學文與樊樹志的論文即多以個別城市或市鎮為討論對象，而非預先設定某個

⁸⁵ 韓大成在此書完成之前發表，而又編入此書的文章，直接可見的有：〈明代的官店與皇店〉，《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4，頁30-35；〈明代牙行淺論〉，《社會科學戰線》，1986：2，頁153-161；〈明代權貴經營的工商業〉，《明代社會經濟初探》，頁356-394；〈明代的集市〉，《文史哲》，1987：6，頁17-25；〈明代交通運輸散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2，頁93-103。

問題後，再進出各城市（城鎮）統合相關材料。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諸書中所收關於城市（市鎮）研究的各篇文章，在寫作上多不是從理論概念出發，而是具體地進入特定城鎮，對此城鎮之社會經濟狀況進行全面性的掌握，再進行相關的討論，他往往喜歡以「社會經濟結構」一詞來做為標題，尤其是《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一書中，大多數文章皆以〈□□鎮的社會經濟結構〉為題，這也反映出他試圖對特定城鎮進行整體性考察的傾向。至於樊樹志則更清楚地強調個案研究的重要，他曾表示：「目前的研究，宏觀分析較多，微觀分析（個案分析）尚嫌不足，需要把兩者結合起來，引向深入。」⁸⁶事實上，他《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一書的寫作方式可以說正是這種微觀與宏觀分析的實踐。此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江南市鎮面面觀〉對市鎮作整體性的討論，屬宏觀的分析；而下卷〈江南市鎮的典型分析〉則完全是個案分析，依府分章，府下所屬之鎮列為小節，每節一鎮充分使用地方志詳論該鎮之發展狀況。要之，無論是陳學文「結構式」的討論，或是樊樹志結合微觀與宏觀的分析，都可以說是研究者試圖全面性掌握城市（市鎮）的作法，呈現出以城市成為討論主體的結果。

當城市史研究突破教條化理論框架，而真正以城市為主體時，因為研究者試圖對城市作整體性的掌握，除既有的社會經濟面向外，也很容易將觀察視野擴及城市其他面向的變化，如此一來，社會文化方面的變化也很容易成為新的關注對象，乃至發展成為新的研究課題。事實上，前所提及的學者傅崇蘭、陳學文、樊樹志等人在其著作中，都曾將其討論範圍延伸於此：《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中有專章討論揚州與蘇州城市文化的發展，《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一書中亦有〈江南市鎮文化一瞥〉之篇章，而陳學文在《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中也有專文討論〈商品經濟的發展對社會意識和民情風俗的衝擊〉。這些探討是過去城市研究較少注意到的，這種視野擴展顯示：城市也不只是個政治、經濟活動的場域，同時也是個文化活動的場域，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城市概念的調整——或者可以說是城市意涵的擴大。

⁸⁶ 樊樹志，〈緒論〉，《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頁 11-12。

事實上，在概念上將城市視為一個生活、文化場域，進而開啟社會文化面向的討論，也正是 80 年代以來明清城市史研究重要的新取徑。前面所舉湖南出版社《中國古代城市生活長卷叢書》的編纂，可說就是這種新研究取徑下的成果展示。這個新取徑和整個社會（生活）文化史研究的被強調，以至成為重要的研究趨勢，是相互關聯的。在明清城市史的研究中，關於社會生活的探討，雖然早在 1929 年即有張其昀撰寫〈明清間金陵之都市生活〉首開風氣，⁸⁷但得相隔 50 年之後，才出現類似的文章——1979 年王宏鈞、劉如仲寫作〈明代後期南京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生活的變化：明人繪《南都繁會圖卷》的初步研究〉遙接陞緒。⁸⁸在這段長久的間隔期間，即使性質相近的文章也寥寥可數。⁸⁹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雖然一開始翦伯贊即已論及明清間經濟發展造成城市生活出現新面貌，⁹⁰但這方面的問題在「萌芽」主題中實屬旁枝，也始終未發展成重要的議題。直到 80 年代以後，城市史研究真正以城市為主體，而社會生活史也為學界強調時，這個議題才真正成為探討的主題。

城市生活史論文的匱乏，一方面可說是過去整體史學研究少致力於社會生活史面向之探討，另一方面也可說是在觀念上城市多被視為政治或經濟活動場域，而少被認為是個生活、文化活動場域。這種情形到了 80 年代開始有相當大的轉變，1984 年，來新夏與劉志琴先後發表〈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會

⁸⁷ 張其昀，〈明清間金陵之都市生活〉，分別載於《史學雜誌》，1：1（1929），頁 1-8；1：2（1929），頁 1-8。

⁸⁸ 王宏鈞、劉如仲，〈明代後期南京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生活的變化：明人繪《南都繁會圖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1，頁 99-106+146+148-149。

⁸⁹ 1956 年許大齡的〈明代北京的經濟生活〉和 1962 年王宏鈞的〈反映明代北京社會生活的《皇都積勝圖》〉算是其中性質較為相近者——兩者分別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9：4，頁 41-63。《歷史教學》，1962：7，頁 43-45+57-58+2。大概是其中少數略涉及於此的論文。

⁹⁰ 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中曾言：「新的城市居民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因而跟著城市居民成分的改變，又改變了城市的風氣，風氣改變的程度不同，一般都是趨於奢侈，因此普遍地引起城中保守的紳士老爺們的慨嘆。早在明朝中葉以後，城市生活就開始變化。」——《北京大學學報》，1955：2，收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頁 390。

風尚〉與〈晚明城市風尚初探〉兩篇有關社會風尚的文章，首開風氣討論商品流行影響社會風氣變化的問題。⁹¹之後，臺灣學者徐泓進一步利用大量方志資料對此問題進行細密的考察，先後寫作〈明末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明代後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兩篇論文，落實這個議題。⁹²此後，隨著社會史研究取徑的強調，關於社會風氣問題的討論成為熱門的議題，至 90 年代相關論文的發表至少已有二十幾篇，⁹³甚至

⁹¹ 來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會風尚〉，《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頁 248-264。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1 輯，頁 190-208。

⁹² 徐泓，〈明末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東亞文化》，第 24 輯（1986），頁 83-110。徐泓，〈明代後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頁 107-174。徐先生的文章雖後出於來、劉兩人，但其考察更為確實且全面，對此議題的確定發揮更關鍵性的作用，這兩篇文章成為後來最常被引用的論文。

⁹³ 就個人所見之不完整書目，除前所舉諸文外，至少尚有：朱子彥、張洁明，〈明清時期烏青鎮的經濟文化與社會風尚〉，《學術月刊》，1988：12，頁 64-71。吳仁安，〈明代江南社會風尚初探〉，《社會科學家》，1987：2，頁 39-46。陳茂山，〈試論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風氣〉，《史學集刊》，1989：4，頁 31-40。王興亞，〈試論明代中後期河南社會風尚的變化〉，《中州學刊》，1989：4，頁 107-110。翼然，〈十七世紀閩南社會經濟風習的變遷〉，《福建學刊》，1990：5，頁 74-77。王新，〈明清時期社會風尚變革舉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3，頁 41-43。樊樹志，〈江南市鎮文化面面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4，頁 61-65。宋傳銀，〈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5，頁 93-97。劉志琴，〈晚明世風漫議〉，《社會科學研究》，1992：3，頁 107-111。藍東興，〈明朝中後期奢侈浮靡之風芻議〉，《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3：2，頁 79-83。劉和惠，〈論晚明社會風尚〉，《安徽史學》，1990：3，頁 23-29。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後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中國史研究》，1992：2，頁 117-124。王翔，〈明清商品經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蘇州大學學報》，1993：3，頁 93-99+136。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吳地民風嬗變研究之二〉，《歷史教學問題》，1993：4，頁 17-20。孟彭興，〈明代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市民社會生活的嬗變〉，《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4：2，頁 166-173。王翔，〈論明清江南社會的結構性變遷〉，《江海學刊》，1994：3，頁 141-148。王衛平，〈明清時期太湖地區的奢侈風氣及其評價：吳地民風嬗變研究之四〉，《學術月刊》，1994：2，頁 56-61。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明史研究》，第 3 輯（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 85-92。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1994：4，頁 53-63。張正明，〈明中葉以來山西民風的變化〉，《晉陽學刊》，1995：3，頁 95-101。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清史研究》，1997：2，頁 106-110。陳學文，〈明代中葉民情風尚習俗及一些社會意識的變化〉，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

有學者已對此展開系列討論，⁹⁴以至集成專書出版。⁹⁵這些討論雖然未必全然侷限於城市，但因城市是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帶動社會風氣變化的先驅，所以，討論範圍主要以城市為主，將這些論文歸納於城市史範圍內應無不可——劉志琴的論文中即直接論斷：社會風尚的變化「在農村並不顯著，……政治中心與商業中心重疊結合這種城市特點，造成了消費人口的高度集中，使得千家萬戶莫不依靠市場供應。商品經濟就這樣滲入人們的生活，進而改變人們的風習。」⁹⁶劉氏也因此直接將其討論範圍界定於城市中，而以城市為題。這些論文顯示城市已被視為一個消費生活的場域，而在這種消費過程中，城市的社會文化已經呈顯出新的面貌。

大體而言，中國大陸學界的城市史研究先後被納入政治史、社會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幾個不同脈絡下思考，而這幾個不同時期的研究取向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研究視野逐步放寬、城市主體日益凸顯的過程。就城市史的研究而言，在某種角度下，應該可以算是個進步的過程吧。另一方面，日本學界對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也頗有成果，而其發展歷程，也大體上與中國學界有相近之處，只不過他們的思考重點較側重於士大夫與民眾問題的思考。

這些關於城市生活或社會風氣問題的探討，對於明清城市社會的發展面貌提供了概略性的了解基礎，大體上可以據此確定明清社會發展的基本輪廓。不過，這些作品在寫作上，往往因襲傳統「風俗」記錄者的觀察視野、書寫方向或價值判斷，而侷限在「風俗」議題上，以「奢靡」問題為考察要點，極力地搜集各種食、衣、住、行等生活方面的描述，據此以證實或斷定

下冊（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1207-1231。

⁹⁴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頁32-42。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二〉，《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8：2，頁157-167。汪維真、牛建強，〈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風尚取向的更移〉，《史學月刊》，1990：5，頁30-36。牛建強、汪維真，〈再論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社會風尚〉，《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1（1991），頁73-77+49。牛建強、汪維真，〈明代中後期江南周圍地區風尚取向的改變及其特徵〉，《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1，頁38-45。牛建強，〈明代江南地區的早期社會變遷〉，《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頁13-19。

⁹⁵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⁹⁶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頁195。

其奢靡或繁華的程度。在這樣的考察下，常常不免籠統地將各種生活情況的變化歸納在「社會風氣」的議題下，以致未能更深入地剖析解讀這些現象變化的結構性意義。如此，「社會文化史」仍未能走出「風俗史」的格局，在問題的探討上仍然停留在社會現象層面，而未能真正掌握社會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

進入世紀之交，生活史與文化史的研究漸成風潮，這也為城市史的研究帶來新的局面，突破以往「風俗史」的格局。或者換個角度可以說，在風俗史的探究，將城市生活的豐富面向揭露後，更激起研究者的興趣，試圖進一步探究其社會與文化意義，而這也就成了生活史與文化史研究的新契機，實則城市史與生活史、文化史在研究取向本有其親近性，而三者的交集更有共存共榮、相得益彰之效。世紀之交時，關於心態史、物質文化的討論正是其中的熱門議題，而這些議題的開發乃多所取材於城市生活的探究，這是個相適應的問題，可以說近世以來城市生活的豐富性正足以作為物質文化的研究素材，而此中精神／物質的互動，也可以展開精采的心態問題討論。在這個風潮下，臺灣的明清史學界可謂得風氣之先，較早乘勢而起開啟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徑，揭露明清城市饒富趣味的新面貌，從而論述其別具深意的社會文化意義。

2000 年李孝悌與王汎森向中研院提出主題研究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計畫成員除主持人外，還包括：劉錚雲、胡曉真、賴惠敏、邱仲麟、巫仁恕、王正華、王鴻泰等人。其執行期間為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每年舉辦一次連續三日左右的大型國際會議，會議主題依序為：「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過眼繁華——明清江南的生活與文化」。這個計畫無論實際執行者或與會的論文，大多與城市生活相關，可說正是將城市史研究更積極地推向社會生活的方向，從而開展出豐富多元的面貌。「明清的社會與生活」執行完畢一段時間後，李孝悌開始規畫組織另一主題計畫——「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此計畫基本成員大抵與前一計畫相同，執行期間為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此三年期間一如往例，每年舉辦為期三日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大會，其主題分別為：「City Life In Jiangnan: From Late Imperial To Early Modern

China」、「進入中國城市：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野」、「中國城市生活的經驗：十五至二十世紀」。此計畫之主旨為：「將焦點轉向明清時期的傳統中國城市，希望能從文化、文學、社會、政治、經濟等不同角度，來說明傳統／中國的城市，已發展出燦然可觀的特殊城市風貌。」可見其包羅面向甚廣，而議論層次也嘗試由生活層面提昇至文化層面，意圖探究生活內容變遷具有的社會文化意義。李孝悌所主持的兩個主題計畫，幾乎跨越整個 21 世紀的最初十年，實際執行期間長達六年，其成員直接生產之論文，以及參與研討會之著作，無論在數量或品質上都相當可觀。⁹⁷至此，城市史研究可謂已臻繁花盛開的階段，而大約在 2010 年左右，中研院近史所也成立了城市史研究群，斯可謂乃時勢所趨，踵事增華。⁹⁸

就實而言，城市史的研究本就包含諸多議題，難以將其單純歸類，只是不同時代裡，論者因關懷所至，形成側重面向與論述重點，略可藉其所重而歸類之；然而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史研究又不乏整合性論著，此則又不宜削足適履勉強歸類，蓋在新的社會史研究風潮下，乃有學者刻意強調跨越學科或領域的藩籬，而城市史的研究也與此趨勢相呼應，且透過不同層面的探索，梳理並架構其關聯性，加以有機性地整合後，所建構出來的城市特性，往往正是論述的要點。這類專論的出現也正標示城市史研究的新境界。

William T. Rowe(羅威廉)在 1984 年與 1989 年先後出版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和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⁹⁹這兩本論著對漢口的社會組織、階級與結構進行

⁹⁷ 這些會議論文，後來選編成兩本論文集出版：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胡曉真、王鴻泰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臺北：允晨文化，2011）。

⁹⁸ 這當中巫仁恕大概可說是最為積極有為者，他後來出版了《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兩本論著，並成為近史所城市史研究群的帶頭人，積極與國外學者合作，推動相關研究。

⁹⁹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及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江溶、魯西奇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 (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魯西奇、羅杜芳譯，

相當精細的考察與分析，借用社會學理論，討論「公共領域」與「衝突」的問題，進而質疑韋伯對中國城市的論斷。這樣的研究涉及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心態問題，論述極具分析性與理論性，挑戰西方主流的城市史觀，為中國城市社會史研究建立了新的範例。世紀之交，社會文化史漸成潮流後，中國城市史研究也受此影響而多著墨於文化層面的考察，甚而以「城市文化形塑」為論述重心。Tobie Meyer-Fong（梅爾清）的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和 Antonia Finnane（安東籬）的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¹⁰⁰這兩本論著針對 16 世紀後的揚州城進行考察，安東籬所論不止時間較長，所涉及面向也較廣，包含經濟、社會、文學、藝術等層面，而商業活動與士商文化是其討論重點，所論涉及社會界限、社會流動與婦女形象，其論述方式多元豐富而深具社會文化史趣味。梅爾清的論著更集中在文化菁英及其文藝活動面向上，大量運用文學資料，透過這些文藝活動與內容的細緻分析，索解清初文人如何形塑「揚州文化」。此作對城市文化的建構過程有相當精巧的論證，在方法上極富啟發性，可說是城市文化研究的示範之作，頗具影響力。¹⁰¹

文化史風潮下的城市史研究，有更多元的觀察視角與解讀方向，對城市的空間想像與人群互動，都有不同的思考取徑，因此對特定城市的研究，也更能深入挖掘其豐富內涵，進而涉入「國家與社會」（或「政府與民眾」）重大命題的討論，也由此來形塑「城市空間」、「城市社會」、「城市文化」的內涵與特性。梅爾清與安東籬對揚州的精采論著出版不久，明代南京也有兩本重要的研究專著：費絲言（Si-yen Fei）的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¹⁰⁰ Tobie Meyer-Fong,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安東籬（Antonia Finnane）著，李霞譯，《說揚州：1550-1850 年的一座中國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7）。

¹⁰¹ 陳熙遠的〈人去樓坍水自流：試論座落在文化史上的黃鶴樓〉一文，在論述手法應該頗受梅爾清著作的影響，該作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頁 367-416。

Late Ming Nanjing (2009)、¹⁰²羅曉翔的《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與都市性研究》¹⁰³。這兩本專著都是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其內容也都包含不同層面的觀察與論述。費絲言從城市的稅制改革與築城問題出發，在偏屬於政治經濟層面的討論之後，進一步涉入社會文化層次，討論士人對城市空間的想像。這些不同層面的考察共同交集出一個由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所建構的「城市空間」，費絲言藉此來與韋伯的理論相對話，挑戰其關於「城市性」的論斷。如此論述深具綜合性與理論性，將中國城市史研究推上一個更具深度的新境界。羅曉翔的論文在費絲言之後出版，其內容也分章討論城市管理、經濟與文化，而且他也在前言部分特別標出「中國城市研究中的『韋伯陷阱』」，特意表明要走出此種陷阱，以南京城為例，重新評價明清時期的「都市性」。二十一世紀初期這些城市史專著的出版，可說是羅威廉對中國城市研究取向的持續發展，都是對韋伯以來對城市與近代性之相關概念的反思，由此出發另闢中國城市史的探討取徑，從而建構新的理解概念，明清城市的特性也因此漸具形態——由費絲言的論著確實可見一個“Negotiating Urban Space”的存在。

結語

在西方近代社會的發展中，城市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近代社會乃形成於城市，如馬克思就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出發點，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從中世紀的農奴中間產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間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¹⁰⁴但是，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城市是不是也扮演同樣的角色呢？這是中國城市史——特別是明清城市史研究所緊緊追問的問題。事實上，整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過

¹⁰² 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¹⁰³ 羅曉翔，《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與都市性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¹⁰⁴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弗·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著，〈共產黨宣言〉，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467。

程中，幾乎所有關於城市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籠罩在這個問題下，甚至許多論及城市發展的文章，其論旨皆有意無意地試圖藉由馬克思或列寧的理論，將明清城市發展與歐洲中世紀末期的城市發展相比較或比附——至少在問題形式上是如此。也就是說，歐洲城市「近代化」的歷程一直是明清城市研究最重要的參考架構，絕大部分的議題都在此參照下產生。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即使最積極主張萌芽說的學者也都承認：中國明清時期的城市事實上與歐洲中古後期的城市並不相同，不可簡單地與之相比擬。其較極端者則認為兩者有根本性的不同，如傅築夫在〈中國古代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說：「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不可能產生歐洲中世紀那樣獨立於封建主直接控制之外的自治的和自由的城市。這一不同，遂使中國的封建經濟結構表現了一個很大的特點，而這一特點對於整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¹⁰⁵既然中國城市自有其特性，而未如歐洲中古時代那般發展成為自治城市，以致誕生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那麼意圖在其中找尋「資本主義」因素豈非緣木求魚，而硬將明清城市史研究納在「近代化」，或者「資本主義萌芽」的命題下，也不無可議。

然而，中國城市發展可否簡單地以「封建制」一詞涵蓋之呢？明清城市發展難道竟一如往昔，只是在封建勢力籠罩下，了無新意？「資本主義萌芽」命題的成立，或有疑義，但其所挖掘出來之諸多史料在在都證明了明清間工商業極為發達，藉此以證實資本主義萌芽，然而其中卻不無方法論上之疑慮，那麼，應該從什麼方向理解此一現象？明清城市發展到底有何歷史意義？除了將之納於「近代化」的命題下，是否可能將之安置於其他意義脈絡中，以議論其種種饒富趣味的變化呢？

無論「資本主義萌芽」命題或論斷是否成立，在此命題下所挖掘、整理出來的種種史料都顯示：明末清初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可以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相當激烈的社會文化變動，而在這個文化的變動中，城市居於極關鍵的地位：它一方面反映了這種變化，在生活樣態上相隨地出現了不同的風貌；另一方面它也推動

¹⁰⁵ 傅築夫，〈中國古代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經濟史論叢》，頁404-405。

了這個變化，城市環境助長，甚至孕育了新的社會文化的滋生。就此可以說：明清間的城市在整個歷史文化發展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事實上，將這些現象納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來理解，更能凸顯城市的意義。然則，如何透析論述城市的社會文化意義，也還是個極具挑戰性的史學命題，史學工作者不應套用任何理論成說，理念先行的輕易論斷，而只能根據各種史料，考察具體的社會生活現象，建構堅固的歷史事實後，再對之進行分析，加以詮釋，由此論述出其文化意涵。

1980年代中期以來，相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漸興，城市生活日趨繁榮，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也越來越熱絡。¹⁰⁶另一方面，1990年以來，明清社會生活史與文化史的討論漸成潮流，而事實上這些討論多是以城市為主要場景，或者可說就是因為明清城市生活的豐富精采，讓生活史與文化史的討論可以從中取材，開發相關議題，乃至對各種生活細節進行細緻的描述與分析，從而展開文化意涵的論述，這才使得生活史與文化史的研究可以繁花盛開般地發展。2000年以後，臺灣史學界也因此多所著力於明清城市的研究，由此發展出多樣且精采的社會生活史與文化史的探討，就此而言，城市史的研究實居於前沿位置，帶動社會史研究的多樣化發展。相對地，生活與文化層面的探究、刻畫，尤其是有關公共生活與文化認同部分的思考，也正可藉以觀測透析城市的特性，從而重新檢討以往關於城市的認知概念及由此建構起來的歷史圖像。

本文於2019年3月20日收稿；2019年6月14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柯淑芳

¹⁰⁶ 參考盧漢超，〈美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頁115-126。熊月之、張生，〈中國城市史研究綜述（1986-2006）〉，《史林》，2008：1，頁21-35+187。王衛平、董強，〈江南城市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1979-2009）〉，《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頁1-6。

徵引書目

近人論著

- 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無賴」をめぐる社会關係：打行と脚夫〉，《史學雜誌》，90：11（1981），頁 1619-1653。
- 于志嘉，〈日本明清史學界對「士大夫與民眾」問題之研究〉，《新史學》，4：4（1993），頁 141-175。
- 川勝守，〈明末・南京兵士の叛亂：明末の都市構造について素描〉，收入星博士退官記念中國史論集編集委員會編，《星博士退官記念中國史論集》，山形市：星斌夫先生退官記念事業會，1964，頁 187-208。
- 川勝守，〈中国近世都市の社会構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について〉，《史潮》，6（1979），頁 65-90。
- 川勝守，〈明末清初の訟師について：旧中国社会における無賴知識人の一形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9（1981），頁 111-130。
- 川勝守，〈明末清初における打行と訪行：旧中国社会における無賴の諸史料〉，《史淵》，119（1982），頁 65-92。
- 川勝守，〈江南市鎮の生産・流通・消費の歴史的位罫：手工業生産と無賴・棍徒・脚夫〉，《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6（1998），頁 1-28。
- 今西春秋，《京師城内河道溝渠圖說》，北平：建設總署，1941。
- 夫馬進，〈明末の都市改革と杭州民變〉，《東方學報》，49（1977），頁 215-262。
- 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東方學報》，52（1980），頁 595-622。
- 夫馬進，〈明代南京の都市行政〉，收入中村賢二郎編，《前近代における都市と社會層》，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0，頁 245-297。
- 夫馬進，〈同善會小史〉，《史林》，65：4（1982），頁 511-550。
- 夫馬進，〈善會、善堂の出發〉，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頁 189-232。
- 夫馬進，〈清代前期の育嬰事業〉，《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11（1986），頁 5-41。
- 夫馬進，〈清末の保嬰會〉，收入《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第 5 卷，東京：岩波

書店，1990，頁 163-190。

孔經緯，〈中國封建社會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新史學通訊》，1955：12，頁 3-7。

孔經緯，〈中國封建社會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收入田居儉、宋元強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上冊，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 339-362。

牛建強、汪維真，〈再論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社會風尚〉，《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1（1991），頁 73-77+49。

牛建強、汪維真，〈明代中後期江南周圍地區風尚取向的改變及其特徵〉，《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1，頁 38-45。

牛建強，〈明代江南地區的早期社會變遷〉，《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頁 13-19。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王日根，〈緒論：令人夢斷魂牽的鄉土情結〉，收入氏著，《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 1-25。

王宏鈞，〈反映明代北京社會生活的《皇都積勝圖》〉，《歷史教學》，1962：7，頁 43-45+57-58+2。

王宏鈞、劉如仲，〈明代後期南京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生活的變化：明人繪《南都繁會圖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1，頁 99-106+146+148-149。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頁 32-42。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二〉，《上海社會科學學術季刊》，1988：2，頁 157-167。

王曼犀，《金陵後湖志》，南京：翰文書店，1933。

王翔，〈明清商品經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蘇州大學學報》，1993：3，頁 93-99+136。

王翔，〈論明清江南社會的結構性變遷〉，《江海學刊》，1994：3，頁 141-148。

王新，〈明清時期社會風尚變革舉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3，頁 41-43。

王煥鑣，《明孝陵志》，南京：鍾山書店，1934。

王劍英，〈明初營建中都及其對改建南京和營建北京的影響〉，收入《歷史地理》，輯 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86-97。

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吳地民風嬗變研究之二〉，《歷史教學問題》，

1993：4，頁 17-20。

王衛平，〈明清時期太湖地區的奢侈風氣及其評價：吳地民風嬗變研究之四〉，《學術月刊》，1994：2，頁 56-61。

王衛平、董強，〈江南城市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1979-2009）〉，《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頁 1-6。

王興亞，〈試論明代中後期河南社會風尚的變化〉，《中州學刊》，1989：4，頁 107-110。

加藤繁，〈唐宋時代の商人組合「行」に就いて〉，收入白鳥博士還曆記念編委會編，《白鳥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25，頁 293-350。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弗·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著，〈共產黨宣言〉，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 461-504。

左雲鵬、劉重日，〈明代東林黨爭的社會背景及其與市民運動的關係〉，《新建設》，1957：10，頁 33-38。

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收入《世界の歴史》，第 11 冊，東京：筑摩書房，1960，頁 41-80。

全漢昇，《中國行會制度》，臺北：食貨出版社，1935 年上海版，1978 年重印。

安東籬（Antonia Finnane）著，李霞譯，《說揚州：1550-1850 年的一座中國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7。

朱子彥、張潔明，〈明清時期烏青鎮的經濟文化與社會風尚〉，《學術月刊》，1988：12，頁 64-71。

朱偁，《金陵古蹟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朱偁，《北京宮闕圖說》，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朱偁，《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朱鴻，〈從南京到北京：明初定都問題的討論〉，《師大學報》，33（1988），頁 259-282。

佐伯有一，〈明末董氏の變：所謂「奴變」の性格に關連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6：1（1957），頁 26-57。中譯本：樂成顯譯，〈明末董氏之變〉，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304-340。

佐伯有一，〈一六〇一年「織傭之變をめぐる諸問題：その一〉，《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冊 45（1968），頁 77-108。

佐藤学，〈明初北京への富民層強制移住について：所謂「富戸」の軌跡を中心に〉，《東洋學報》，64：1、2（1983），頁 69-98。

何一民，《中國城市史綱》，成都：四川大學，1994。

吳大琨，〈評〈明清之際中國市民運動的特徵及其發展〉〉，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 273-283。

吳仁安，〈明代江南社會風尚初探〉，《社會科學家》，1987：2，頁 39-46。

吳奇衍，〈清代前期牙行制度試述〉，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輯 6，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6-52。

吳晗，〈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清華學報》，10：4（1935），頁 917-940。

呂作燮，〈試論明清時期會館的性質和作用〉，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頁 172-211。

宋傳銀，〈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5，頁 93-97。

巫仁恕，〈明清近代市鎮墟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九州學刊》，5：3（1993），頁 95-112。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上）〉，《清史研究》，2001：3，頁 9-22。

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中）〉，《清史研究》，2002：1，頁 62-70。

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下）〉，《清史研究》，2002：2，頁 9-16。

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清史研究》，1997：2，頁 106-110。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歷史研究》，1978：4，頁 63-79。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收入谷風出版社編輯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

- 研究論文集》，上冊，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269-304。
- 李福鐘，〈到改革開放之路〉，收入氏著，《改造一個共和國》，臺北：稻鄉出版社，1993，頁 103-127。
- 杜黎，〈鴉片戰爭前上海行會性質之嬗變〉，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頁 141-171。
- 汪槐齡，〈明萬曆年間的市民運動〉，《歷史教學》，1959：6，頁 23-27。
- 汪維真、牛建強，〈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風尚取向的更移〉，《史學月刊》，1990：5，頁 30-36。
- 來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會風尚〉，收入《中國文化研究集刊》，輯 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頁 248-264。
- 和田清，〈會館公所の起原に就いて〉，《史學雜誌》，33：10（1922），頁 808-811。
- 孟彭興，〈明代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市民社會生活的嬗變〉，《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4：2，頁 166-173。
- 尚鉞，〈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歷史研究》，1955：3，頁 85-134。
- 尚鉞，〈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的停滯、變化和發展〉，《教學與研究》，1955：6，頁 28-42。
- 尚鉞，〈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的停滯、變化和發展〉，《教學與研究》，1955：7，頁 29-37。
- 尚鉞，〈清代前期中國社會之停滯、變化和發展〉，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160-237。
- 尚鉞，〈中國人民大學討論《明清之際中國市民運動的特徵及其發展》〉，《新建設》，1959：6，頁 63-64。
- 尚鉞，〈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二三事〉，《歷史研究》，1959：7，頁 25-50。
- 尚鉞，〈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二三事〉，收入氏著，《尚鉞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397-436。
- 岸本美緒，〈「五人」像の成立〉，收於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 503-534。
- 邱仲麟，〈明代北京都市社會的變遷（1368-164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 邱澎生，〈導論〉，收入氏著，〈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

-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頁 1-19。
- 邱澎生，第一章〈導言〉，收入氏著，《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0，頁 1-20。
- 侯仁之，〈北平金水河考〉，《燕京學報》，30（1946），頁 107-133。
- 侯仁之，〈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5：1，頁 139-165。
- 侯仁之、吳良鏞，〈天安門廣場禮贊：從宮廷廣場到人民廣場的演變和改造〉，《文物》，1977：9，頁 1-15。
- 侯仁之，〈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收入氏著，《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 272-307。
- 施堅雅（G.W. Skinner）著，余葦青、黃飛虎譯，〈中國城市與地方系統的等級〉，收入李范文、陳奇猷等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 1 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 96-192。
- 施堅雅（G.W. Skinner）著，余葦青、王東生譯，〈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收入李范文、陳奇猷等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 2 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1-58。
- 施堅雅（G.W. Skinner）著，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 洪煥椿，〈論明清蘇州地區會館的性質及其作用：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剖析之一〉，《中國史研究》，1980：2，頁 3-15。
- 洪煥椿，〈明清蘇州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初步考察：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剖析〉，收入谷風出版社編輯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下冊，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494-555。
- 胡曉真、王鴻泰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臺北：允晨文化，2011。
- 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9：3（1998），頁 87-134。
- 倉持德一郎，〈明初における富民の京師移徙：所謂「富戸」の設定〉，收入《石田幹之助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石田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1965，頁 239-252。
- 唐文基，〈明代的鋪戶及其買辦制度〉，《歷史研究》，1983：5，頁 140-150。

- 宮崎市定，〈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輕工業の發達〉，《東方學》，2（1951），頁 64-73。
-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素描の試み〉，《史林》，37：3（1954），頁 1-33。
- 徐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復刊》，10：3（1980），頁 82-116。
- 徐泓，〈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2：2（1984），頁 569-598。
- 徐泓，〈明末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東亞文化》，第 24 輯（1986），頁 83-110。
- 徐泓，〈明代後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頁 107-174。
- 徐泓，〈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暨大學報》，3：1（1999），頁 25-75+381。
- 徐泓，〈明初南京皇城、宮城的規劃，平面佈局及其象徵意義〉，《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7（1993），頁 79-95。
- 徐泓，〈從「軍七民三」到「軍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廣東的築城運動〉，《中國地方誌》，2018：1，頁 75-92。
- 徐新吾，〈商人資本在棉手工業中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收入氏著，《鴉片戰爭前中國棉紡織手工業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 72-102，
- 徐新吾，〈商人資本在棉手工業中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收入田居儉、宋元強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下冊，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 665-696。
- 栗林宣夫，〈萬曆十年の杭州民變について〉，收入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事業會編，《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76，頁 223-234。
-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1994：4，頁 53-63。
- 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後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中國史研究》，1992：2，頁 117-124。
- 張正明，〈明中葉以來山西民風的變化〉，《晉陽學刊》，1995：3，頁 95-101。
- 張其昀，〈金陵史勢之鳥瞰（上）〉，《東方雜誌》，23：13（1926），頁 73-86。
- 張其昀，〈金陵史勢之鳥瞰（下）〉，《東方雜誌》，23：15（1926），頁 71-90。
- 張其昀，〈首都之國防上價值〉，《地理雜誌》，1：2（1928），頁 53-56。
- 張其昀，〈明清間金陵之都市生活（上）〉，《史學雜誌》，1：1（1929），頁 1-8。
- 張其昀，〈明清間金陵之都市生活（下）〉，《史學雜誌》，1：2（1929），頁 1-8。

- 張其昀，〈首都之地理環境（上）〉，《地理雜誌》，3：2（1930），頁 1-8。
- 張其昀，〈首都之地理環境（下）〉，《地理雜誌》，3：4（1930），頁 1-10。
- 張其昀，〈首都之地理環境（中）〉，《地理雜誌》，3：3（1930），頁 1-8。
- 張奕善，〈明成祖政治權力中心北移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10、11 期合刊（1984），頁 243-357。
- 梁其姿，〈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收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國海洋發展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頁 97-130。
- 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間慈善活動的興起：以江浙地區為例〉，《食貨月刊》，15：7・8 合刊（1986），頁 304-331。
- 梁其姿，〈清代慈善機構與官僚層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6（1989），頁 85-103。
- 梁其姿，〈清代的惜字會〉，《新史學》，5：2（1994），頁 83-115。
-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 許大齡，〈明代北京的經濟生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9：4，頁 41-63。
- 郭蘊靜編，《天津古代城市發展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 陳正祥，〈北平的城市發展〉，收入氏著，《中國文化地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頁 101-134。
- 陳忠平，〈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牙人與牙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2，頁 31-38。
- 陳怡行，〈明代的福州：一個傳統省城的變遷（1368-1644）〉，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陳怡行，《從晚明到清初的福州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7。
- 陳茂山，〈試論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風氣〉，《史學集刊》，1989：4，頁 31-40。
- 陳熙遠，〈人去樓坍水自流：試論座落在文化史上的黃鶴樓〉，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頁 367-416。
- 陳學文編，《嘉興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5。

陳學文編，《湖州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成於 1989 年），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出版年不詳。

陳學文，〈明代中葉民情風尚習俗及一些社會意識的變化〉，收入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冊，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 1207-1231。

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陳學文，〈論江南市鎮史的研究〉，《九州學刊》，6：3（1994），頁 125-138。

陳橋驛，〈讀《中國王朝時代晚期的城市》的兩篇書評〉，《杭州大學學報》，1980：4，頁 34-37。

傅衣凌，〈明代蘇州織工、江西陶工反封建鬥爭史料類輯：附論手工業勞動者在農民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收入氏著，《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 327-337。

傅衣凌，〈明代江南的紡織工業與織工暴動〉，收入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 93-120。

傅衣凌，〈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收入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 121-151。

傅衣凌，〈論明清時代的棉布字號〉，收入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 152-156。

傅衣凌，〈生產、交換、市場〉，收入氏著，《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 118-159。

傅崇蘭，《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傅築夫，〈中國古代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403-485。

彭雨新，〈明清時期的鋪戶作坊和資本主義萌芽〉，《江漢學報》，1962：5，頁 36-42。

彭雨新，〈明清時期的鋪戶作坊和資本主義萌芽〉，收入谷風出版社編輯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冊，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251-268。

彭澤益，〈《織工對》史料能說明中國手工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嗎？兼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運用史料與論證方法上存在的問題〉，《經濟研究》，1958：4，頁 75-88。

彭澤益，〈鴉片戰爭前清代蘇州絲織業生產關係的形式與性質〉，《經濟研究》，1963：10，頁 63-73。

彭澤益，〈《織工對》史料能說明中國手工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嗎？兼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運用史料與論證方法上存在的問題〉，收入田居儉、宋元強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上冊，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 405-432。

彭澤益，〈鴉片戰爭前清代蘇州絲織業生產關係的形式與性質〉，收入谷風出版社編輯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冊，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428-456。

彭澤益，〈中國行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88：6，頁 3-19。

森正夫，〈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會の反亂について〉，收入明清史論叢刊行會編，《中山八郎教授頌壽記念明清史論叢》，東京：燎原書店，1977，頁 195-232。

森正夫，《奴變と抗租：明末清初を中心とする、華中・華南の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民衆の抵抗運動》，名古屋：昭和 54・55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 C)「抗租運動の長期的比較的綜合的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1981。

程子良、李清根主編，《中國城市史叢書：開封城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華繪，〈明代定都南北兩京的經過〉，《禹貢半月刊》，2：11（1935），頁 34-41。

賀樹德，〈明代北京城的營建及其特點〉，《北京社會科學》，1990：2，頁 111-118。

黃佩瑾，〈關於明代國內市場問題的考察〉，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明清社會經濟型態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 198-262。

程演生輯，《北平地方研究叢刊·第 2 輯·故都紀念集》，臺北：古亭書屋，1970。

奧斯伍爾德·喜仁龍（Oswald Siren）著，許永全譯，《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

新田牧雄，〈明清時代北京にみる都市区画考〉，《埼玉地理》，1（1977），頁 15-20。

楊向奎，〈《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序言〉，收入傅崇蘭，《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 1-3。

楊其民，〈買賣中間商人「牙人」、「牙行」的歷史演變：兼釋新發現的《嘉靖牙帖》〉，《史林》，1994：4，頁 8-13。

-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葛定華，《金陵明故宮圖考》，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組，1933。
- 熊月之、張生，〈中國城市史研究綜述(1986-2006)〉，《史林》，2008：1，頁 21-35+187。
-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 趙毅，〈鋪戶、商役與明代城市經濟〉，《東北師大學學報》，1985：4，頁 34-40。
- 齊功民，〈明末市民反封建鬥爭〉，《文史哲》，1957：2，頁 38-46。
- 劉永成，〈解釋幾個有關行會的碑文〉，《歷史研究》，1958：9，頁 63-70。
- 劉永成，〈試論清代蘇州手工業行會〉，《歷史研究》，1959：1，頁 21-46。
- 劉永成，〈解釋幾個有關行會的碑文〉，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 488-500。
- 劉永成、赫治清，〈論我國行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頁 117-140。
-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 劉石吉，〈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綜論近年來大陸學界有關明清市鎮的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1988)，頁 171-198。
- 劉志琴，〈試論萬曆民變〉，收入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處論文組編，《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678-697。
-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收入《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頁 190-208。
- 劉志琴，〈晚明世風漫議〉，《社會科學研究》，1992：3，頁 107-111。
- 劉和惠，〈論晚明社會風尚〉，《安徽史學》，1990：3，頁 23-29。
- 劉炎，〈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歷史研究》，1955：6，頁 29-59。
- 劉炎，〈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收入田居儉、宋元強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下冊，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 589-625。
- 劉重日、左雲鵬，〈對「牙人」、「牙行」的初步探討〉，《文史哲》，1957：8，頁 33-40。
- 劉重日、左雲鵬，〈對「牙人」、「牙行」的初步探討〉，收入谷風出版社編輯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冊，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228-250。
- 劉敏，〈商人包買主產生的歷史條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3，頁 53-59+83。
- 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明史研究》，第 3 輯，合肥：黃山書社，1993，

頁 85-92。

樊樹志，〈江南市鎮文化面面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4，頁 61-65。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5：2，頁 79-124。

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338-400。

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鄧拓，〈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人民日報》，1955 年 1 月 9 日。

鄧拓，〈從萬曆到乾隆：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個論證〉，《歷史研究》，1956：10，頁 1-31。

鄧拓，〈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69-90。

鄧拓，〈從萬曆到乾隆：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個論證〉，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 133-182。

鄭力鵬，〈福州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所博士論文，1991。

鄭克晟，〈明代的官店、權貴私店和皇店〉，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 1 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頁 173-184。

鄭鴻笙，〈中國工商業公會及會館、公所制度概論〉，《國聞周報》，2：19（1925），頁 19-21。

黎澍，〈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歷史研究》，1956：4，頁 1-25。

黎澍，〈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742-780。

黎澍，〈中國的近代始於何時？〉，《歷史研究》，1959：3，頁 1-11。

黎澍，〈中國的近代始於何時？〉，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 354-370。

橫山英，〈中國における商工業労働者の發達と役割：明末における蘇州を中心とし

- て》，《歷史學研究》，160（1952），頁 1-13。
- 盧漢超，〈美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頁 115-126。
- 戴均良，《中國城市發展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 翼然，〈十七世紀閩南社會經濟風習的變遷〉，《福建學刊》，1990：5，頁 74-77。
- 謝敏聰，《明清北京的城垣與宮闕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 謝敏聰，《宮殿之海紫禁城》，臺北：世界地理雜誌社，1983。
- 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臺北：食貨出版社，1934 年初版，1978 年重印。
- 韓大成，〈對黎澍同志「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一文的幾點意見〉，《歷史研究》，1956：7，頁 63-78。
- 韓大成，〈明代的官店與皇店〉，《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4，頁 30-35。
- 韓大成，〈明代牙行淺論〉，《社會科學戰線》，1986：2，頁 153-161。
- 韓大成，〈明代權貴經營的工商業〉，收入氏著，《明代社會經濟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356-394。
- 韓大成，〈明代的集市〉，《文史哲》，1987：6，頁 17-25。
- 韓大成，〈明代交通運輸散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2，頁 93-103。
- 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 韓東洙，〈清代府城的城制與營建活動之研究－以省城分析為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藍東興，〈明朝中後期奢侈浮靡之風芻議〉，《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3：2，頁 79-83。
- 羅一星，《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江溶、魯西奇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魯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羅曉翔，《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與都市性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 1984 年 10 月 20 日通過）〉，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重要文獻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768-795。

Farmer, Edward L.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Fei, Si-yen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innane, Antonia.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eyer-Fong, Tobie.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ote, F. W.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W. Skinner, 101-15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iren, Osvald.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Lo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imited, 1924.

Von Glahn, Richard. "Municipal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Jiangn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2(1991): 280-307.

Wakeland, Joanne Clare.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 Ming China: Sixteenth Century Pek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8.

Wright, Arthur F. "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3-73.

Constructing an Image of the City: Shifting and Expanding Research on the Urban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China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ang, Hung-tai *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Ming and Qing urban history, exploring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surveying the ways that scholars of divergent traditions created various impressions of Chinese citi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general, 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gan in the 1930s, emerging from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y the 1960s, urban historical research developed mostly in the context of socioeconomic history. By the 1990s, urban research directions turned toward the history of social life as well as cultural history, opening up a rich portrayal of cultural life in the city.

Keyword: Sprouts of capitalism, urban society, urban social classes,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